

巴山夜雨

抢救记忆 追寻真相 交流信息 积累资料

第 19 期 2012 年 12 月 20 日

目 录

【按“Ctrl”键+鼠标点击篇名选择】

关爱贵州抗战老兵·孙丹年	2
焚火之后的大水井地主庄园·谭 松	10
反右运动 55 周年祭·雷崇功	17
右派大学生民主思想的形成·陶渭熊	20
我们那一网·雷崇功	23
我的“右派”经历·龚韵琴	28
金桂香里，魂归故土·谭 松	31
右派长恨歌·血燃冰	32
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这本经还能念吗？·茆家升	33

《巴山夜雨》电子邮箱：bsyy1957@Yahoo.cn

关爱贵州抗战老兵

孙丹年



一、肖方仲：并非“衣锦”却“荣归”

2012年11月29日下午4点多钟，一列从湖南开来的火车缓缓驶入遵义火车站。卧铺车厢内，一位耄耋长者用浑浊的目光凝视着窗外。他少年离家，参军抗战，浴火疆场，一生漂泊又一生记挂家乡。现在风烛残年了，终于回到老家，本该欣慰，本该欢笑，但他却快乐不起来——他担忧自己的身份既不是华侨，也不是台湾同胞，更不是回乡投资的企业家或慈善家，没能给家乡和亲友带回任何物质利益，家乡亲人们会欢迎自己吗？

他那沟壑纵横的老脸上，挂上了一丝忧郁。

他的名字叫肖方仲，1923年生，现年89岁，遵义新蒲镇中坪人。1939年抗战出征时16岁，现定居湖南汨罗县。他曾于1960年代回来过一次，但那是遥远的过去，记忆中已经模糊不清。

他看见遵义火车站的站台上，有身着大红服装的腰鼓队，击打出一片热情的欢声；又有一群戴着小红帽的学生，拉开数条横幅；还有人捧着鲜花，举着锦旗。陪同的亲友和志愿者将他搀扶下了火车，

有人给他戴上一顶写有“关注抗战老兵慰问团”字样的小红帽。他步履蹒跚，几乎是被架着走过站台的。一群戴小红帽的年轻人围上来，将一束鲜花捧到他面前，又将一面锦旗递到他手中。这时他看清了横幅上的大字“热烈欢迎抗日老兵肖方仲回家”。他没有来得及看清楚锦旗上的字：“抗日英雄 民族脊梁 功昭日月 国人共仰”，更没有看清楚锦旗上的落款：“贵州省青年服务志愿基金会，关注黔籍抗战老兵志愿服务者慰问团”。

不过，这都不要紧，老人被荣誉和幸福笼罩，他身边簇拥着一大群民间志愿者和媒体记者，横幅，标语，锦旗，鲜花，照相机的闪光灯不停地辉耀，共同组成一幅美丽的画面，许多人的眼眶都湿润了。

一位志愿者负责人高声致辞，措词亲切，充满着故乡的召唤。人们热情鼓掌，然后学生们唱歌。老人不知道这首歌名为《老兵》，是遵义人自己创作的，现在由遵义的年轻人自己演唱，但是他感到很温暖，沉浸在幸福中。



大家合影留念，这一时刻便定格，凝固在时光中。

然后，老人被搀扶上了一辆轿车，一共四辆车送他回家。天阴了，下起小雨，满地泥泞。前面修路，轿车过不去，只有一辆越野车能通行，这是贵阳一位企业家兼志愿者周继红的车，他亲自开着车。于是周继红一趟又一趟，将老兵和志愿者以及媒体人员送到老兵家的山脚下，也有部分人踏着稀泥步行。

老人的家乡亲属已经在山脚下等了好久，并备好一乘滑竿，抬着老人回家。人们踩着稀泥爬上山坡，再拐个弯，将老人一直送回家中。亲属们已经备好热气腾腾的饭菜，热情招呼大家坐下。此间媒体记者抓紧采访，忙个不停。

老人在风烛之年荣归故里，一生的困苦都在此刻得到补偿，无论是战场硝烟的危险，无论是身处异乡的艰辛，都值了。现在他很陶醉，脸上洋溢着幸福。



二、汪再祥：抗日军人不是伪军

离开肖方仲家，冒着淅沥小雨，一行人赶往数十公里外的另一位老兵汪再祥家。

汪再祥，再过几天就满 90 岁了，世居遵义绿塘镇。在祖传屋基上，由子女们共同出资，刚刚新



建了宽大的楼房。主楼完工了，但院坝和四周还没清理，门前坑坑洼洼。

汪再祥 16 岁上中学时，主动报名参加了远征军，编入新六军第二十二师（师长廖耀湘）无线通讯团（这批新兵按照文化程度编队，有文化的编入“无线通讯团”，没文化的编入“有线通讯团”）。他们先被送到印度东北角的兰姆加受训。然后他担任了无线通讯团里的电台台长。

赴缅甸参战，他参加第一战就负伤了，那是在缅甸的新贝洋战斗中。他将电台抱在胸前，一块弹片飞来，击中了电台，他侥幸躲过死亡。但四溅的弹片碎屑扎进他的身体，同时嵌入了左锁骨、右手小指、左手腕和双腿。他被送回印度兰姆加医治，右手小指残废了。这些弹片碎屑都太小，许多都没有取出，永远留在身体的各个部位。后来他自己用刀子把小腿上一处碎屑挖出来了。

抗战胜利，他被运送到东北打内战，在辽沈战役中投诚，当了解放军。新中国成立后，不几年他就成了“历史反革命”，被长期管制。文革结束，到 1980 年代获得平反。

他有 2 个儿子、6 个女儿，都很孝顺，安享天年，其乐融融。已年届 90，他身体硬朗，耳聪目明，亲手种菜种花，松土挑肥。

汪再祥对志愿者们非常欢迎，热情洋溢。在没来得及装修、尚为清水房、因此显得清冷的宽大房间里，他早早地打开一只大型电子取暖器，烤上许多葵花籽和南瓜籽，在三张单人沙发床和一张双人床上，铺开了厚厚的被褥，摆出他最喜欢吃的糕点水果，沏上香茶。

由于修路改道，加上天黑下雨，志愿者们迷了路，迟迟未到，他等了又等，打电话问了又问，直等到汽车进入院坝，他和老伴笑脸相迎。

汪再祥对志愿者们讲述他的战场经历，历历如在目前，把大家带进战火纷飞的岁月中。他唱起了抗战歌曲，一首接一首，沉浸于当年的战争氛围。他斗志旺盛，歌声激昂，不错字，不结巴，不重复，记忆非常清楚，中气十足，歌声中充满了抗战军人的荣誉感和战争胜利者的自豪感。

老人是堂堂正正的抗战军人，入缅作战的远征军，满腔热血，胆气宏壮，敢于为不平等待遇而抗争。2005 年，正当抗战胜利 60 周年，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大会发言，正式肯定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为抗战老兵颁发奖章，但是不颁给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老兵。汪再祥不服气，他找到当地民政部门质问：“凭什么不给我们颁发奖章？”

民政部门的人反问：“你是伪军官，为什么要给你颁发？”

汪再祥大怒，反驳道：“我不是伪军官！我不是汉奸，不是汪精卫的伪军，怎么说我是伪军官？”他想了想说：“你如果说我是旧军官，我承认，我是上一个政府的军人。”

之后他和老伴到了北京，找到民政部，民政部一个办事员鄙夷地看着他说：“你一个国民党小兵，还找到北京来了！”

他还没说话，他的老伴上前大声质问：“国民党怎么了？没有国民党正面战场把日本鬼子打跑，哪有你的今天！”那人不吭气。

当抗战胜利 65 周年的时候，由全国性的关爱抗战老兵志愿服务者慰问团出面，组织制作了“抗战胜利 65 周年纪念章”和锦旗，给寻找到的没有获得过奖章的抗战老兵，每位赠送一份。

志愿者的到来使汪再祥兴致勃勃。第二天清早，老人带领志愿者们到房前屋后转悠，来到每年花

30 元钱租来的一块土地上，看他种的蔬菜、鲜花和药材，一边讲述童年的事情、少年的事情，指点安息着他父母的大墓，记忆非常清晰。大家在他出生的院子也是参军离家的院子合影留念，再到绿塘镇上转悠。老人还要带领大家去看绕镇而过的小河，但是时间不允许了，志愿者们还要赶到湄潭县去看望另一位老兵，分别的时刻到了。

老人不高兴了，他沉下脸来，大家清楚地看到泪花在他的眼眶里闪烁。老人郑重地将“抗战胜利纪念章”挂在胸前，双手握着锦旗，和志愿者们在晒台上合影。志愿者们到了楼下，向他挥手，老人也在楼上频频挥手。

三、刘天锡：曾担任蒋介石侍从室警卫

刘天锡今年 94 岁，世代代居住在湄潭县洗马镇。他家是当地大族，清道光年间曾出过一个朝廷六品大员，留下的祖坟很光鲜，至今保存基本完好。家中有大片地产，家道殷实，土改时给他家评的成分是大地主。



他早年一直在读书。小时候在本地洗马小学读书，再到湄潭县初中，抗战前上贵阳清华高中。1938 年 11 月考入黄埔军校第 16 期（成都中央军校）。从成都中央军校毕业后，保送杭州警校，教学内容相当于今天公安学校的教授内容。但当时杭州已经沦陷，警校空有名称，它的实体已搬迁到贵州息烽，通称“军统息烽训练班”。刘天锡在息烽接受了特工的行动训练（擒拿格斗，跟踪抓捕等），沈醉是息烽训练班的

教官，是他的老师。

从息烽班毕业，他被选入蒋介石侍从室当警卫，工作地点在歌乐山下的磁器口。他在同事中年龄较大，同事都称呼他为“大哥”。

1944 年他在重庆结婚了，妻子名叫杨剑书，沙坪坝南开中学毕业生。大儿子、二儿子分别于 1944、1945 年出生。他们一共生育了四个孩子。

1945 年下半年，抗日战争尚未结束，刘天锡被派往中美合作所特警训练班（应为特警班第二期）当教务科长。训练班主任是戴笠，但戴笠一般不到场，具体负责的是副主任乐干。他的主要职责是负责领取、分发由外地送来的各类物资，有中国的物资也有美国的物资，如枪械弹药、器械、车辆等。也作情报汇总的工作，各国的情报都有。运来的狗（训练用的警犬），有中国狗，也有美国狗。运来的马亦如此。他要办理的杂事情很多。



（左图：本文作者与刘天锡）

在中美合作所特警班工作时期，他住在五灵观，住的平房。五灵观的家属可以和外面的人来往，但活动地点仅限于五灵观。外人一般也根本进不去，到处是岗哨和便衣。歌乐山通成都的官道可以任由老百姓走动，小路、大路都可以通行，但沿途到处有游动哨，比如卖香烟的、茶水的、卖小食品的等等，都是便衣特工。

军统的殉职及牺牲人员都埋在电台岚垭，那里的坟墓立有大大小小的很多墓碑，其中有一块大碑。每当年节都要去拜墓，大家先吃团圆饭，戴笠也来，围坐在圆桌旁，互相敬酒。吃完饭后，由戴笠领着去拜墓。

1945年冬天至1946年7月为中美合作所结束期，他正在磁器口办移交，沈醉来了。沈醉当时是军统云南站负责人，沈醉叫刘天锡和他一起去广西布置暗杀李宗仁的任务（但实际上并未实施暗杀）。沈醉这一安排让他躲过了参加内战。于是刘天锡来到广西柳州和桂林，他领着两个勤务兵，一边在柳州办移交，一边跟踪监视着李宗仁，活动经费从桂林的军统会计室

领取。直到1949年5月8日李宗仁飞广州（再经香港转国外）。

1949年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大败，局势紧张，当时他的军衔为上校（团长），但已无可归属。本来安排他和会计科长郭文翰一起去台湾的，他送郭文翰上了去台湾的飞机，但他没有上飞机，妻儿都在桂林，已经有三个孩子了，妻子肚里还怀着一个。来不及带家属。

1950年初，过完春节，正月间他回到贵州家中。刘天锡在家里过了一年，到1951年正月，来了很多公安人员，持短枪将他家包围住，他被逮捕。因为没有参加内战，逃过一死。他不够战犯级别（他是校级而非将级），但是关押中按照战犯对待。他看到过自己的判决书，这份判决书没有公布，是当时的看守所长悄悄给他看的，这个看守所长曾经在军统当排长，后来投诚解放军的。他至今记得判决书主要内容为：

- 一、黄埔毕业生，系蒋介石的信徒；
- 二、杭州警校毕业生，系蒋介石的帮凶；
- 三、中美合作所人员，伙同外国人残杀中国人。

先被关押于贵阳花溪监狱，戴着手铐，关了很长一段时间。转贵定县，又关押较长时间。1963年转凯里，这时已不关押而是办学习班，作战犯对待，等于软禁，伙食很好，每天鸡鸭肉食，都是用汽车运来。文革中在丹寨县汞矿劳改。1976年特赦。

特赦回家后，得知妻子和一个儿子在大饥荒中饿死了。因为无钱葬妻，他的哥哥将一个儿子送了人换取丧葬费，送出去这个孩子，虽然人家对他很好，但也生病死了。剩下的两个儿子跟着他的哥哥

长大，饿得皮包骨，都受歧视没能上学。

他心里很痛苦凄凉，想到自己为旧政权服务就那么 6、7 年时间，换来 25 年牢狱生涯，把妻儿都搭进来了。这时县政协按照优待战犯的政策，叫他去参加工作，又有中学来叫他去担任英语教员，他很抵触，没有去。

按照战犯特赦政策，他每月有一点生活费，跟两个儿子一起过。1976 年回家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直到 1980 年代前期，都处于极度贫困之中，饿得半死，全靠红萝卜、白萝卜充饥，偶然吃上红苕都觉得很珍贵。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后，儿子学木匠，外出打工，渐渐生活好起来。

令他宽慰的是，孙子们有出息。虽然儿子都没能上学，没有文化，但三个孙子很争气。长孙勤劳简朴，在家务农，孝敬着他；二孙子从山东大学毕业后到上海飞机制造厂工作；小孙子从贵州大学毕业，现在贵州省公安厅工作。

现在，经济上根据各种政策，他能得到低保、养老保、高龄补贴等，每个季度两三千元钱（每月数百至一千元）。儿子代他交纳农村医保费。患有疝气和风湿，所幸无大病。

四、关爱黔籍抗战老兵志愿者慰问团

关爱黔籍老兵志愿者慰问团，初建于 2005 年，由一位名叫李建华的民营企业领头。对抗战老兵，李建华情有独钟，曾经每年都赴滇西举办慰问活动，并将志愿者活动推广到全社会。2005 年他发起“去云南寻找老兵”活动，在报纸上公布消息，激发起人们的爱心，许多人热血沸腾地参加。他们多次赴云南腾冲等地寻找和慰问老兵，延续至今。

寻找并慰问抗战老兵的基本程序如下：

每当有人提供抗战老兵的线索，志愿者们就先上门拜访，了解情况。送上 100 元钱作见面礼，询问年龄、参军时间、所在部队番号、上级姓名、所参加的战役或战斗等等。如果符合 83 岁以上、1937 至 1945 年时段在抗战部队里、执行过任务等必要条件，情况属实，便确认了抗战老兵身份，就送上代表荣誉的锦旗和纪念章。由于正面战场的老兵住房条件都比较差，还送上一次性 500 元租房费，以及老人需要的拐杖、热水袋、护膝、棉鞋、随身听等，再加面条、牛奶、酒、大礼包等礼物。

全贵州已经发现当年“草鞋兵”180 多位（绝大多数为投身抗日正面战场的军人），包括散居在云南的贵州籍老兵十多个。已经整理出基础材料的 140 多位，写成小传并集结成《贵州草鞋兵》一书的 69 位。《贵州草鞋兵》受到读者欢迎，已再版过一次。

慰问抗战老兵的志愿者组织是全国性的，大约有十多个省市都成立了组织。志愿者的活动都是合法的，预先要征得民政部门同意，媒体参加。抗战胜利 65 周年时，全国的慰问抗战老兵志愿者组织制作了一共 999 枚“抗战胜利 65 周年纪念章”（贵州得到了其中的 48 枚）和锦旗。纪念章和锦旗还在继续制作。

志愿者创建有“互助论坛”、“关爱老兵抗战网”等通联渠道。

现在，遵义市的慰问团负责人是何飞，一位精明强干的民营企业家，笑容很阳光很和善，让人信任。他有胸襟器量，人缘非常好。

贵阳的慰问团负责人是蒋小华，一位中年女士，个子娇小、容貌清秀，她是国企员工。蒋小华为

人大度，不矫情，不做作，很有亲和力。蒋小华说起一个个抗战老兵，栩栩如生，鲜活如在眼前。她说某黔籍老兵现住云南腾冲，已经双目失明，听说是贵州家乡的人来看望他，激动得唱起了当年的军歌和战歌，一首接一首，记忆清晰，吐字清楚。另一位也在腾冲的贵州籍老兵，多年前希望回家乡看看，努力存钱作路费，因为贫困，存了很多年，终于上路。结果走到昆明钱就花光了，含泪返回……

志愿者梁茂林，贵州教育出版社的资深编辑，一位很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忠诚于文化出版事业，善于发现有价值的选题，已经负责组织、编撰和出版了“多彩贵州旅游系列”、“民国时期贵州教育家系列”、“黔籍抗战老兵系列”等意义重大的系列丛书。现在已经退休了，还在为出版事业奔波。他积极参加关爱黔籍抗战老兵慰问团当志愿者，继续组稿编写出版与此相关的系列图书。

一直辛苦担任驾驶员的周继红，是成功的企业家，也是政协委员。周继红说，企业家赚了钱，除了事业发展所需及生活所需外，富余的钱财应该全部用于慈善。同行的志愿者曾祥华，曾是化工厂职工，现在是自由职业者。

慰问金、慰问品及活动费用都是志愿者们自己捐赠筹集的。

志愿者们很低调，他们不宣传自己，往往在活动结束后连记录也没有留下。

五、慰问抗战老兵的意义

贵州教育出版社老编辑梁茂林对慰问抗战老兵活动的意义，认识非常清楚，他对遵义广播电台的记者说：“抗战胜利60周年胡锦涛总书记讲话，说抗战胜利是中华民族全体同胞团结奋斗的结果，承认了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的抗战功绩。散失在各地的抗战老兵，是非常特殊的群体，他们需要社会关爱。全社会每一个人，尤其是老年人，都应该得到尊重，而这些抗战老兵更应该得到尊重，这才是和谐社会。”

在遵义火车站，我向身旁一位中年女士咨询：我一直认为，遵义给外界的印象就是中共的“伟大转折”，这里是“红军城”，遵义政府和遵义人民长期以来都是关注和宣传红军烈士、红军老兵、红军后代。

她用极其朴实的语言回答我：共产党的老兵，一直有政府在关心照顾，而正面战场的老兵缺少关爱，他们都年老多病，有的还残疾，家庭经济一般都处于贫困状态，生存艰难。子女从小受“家庭出身”连累，文化不高，也大多家境不富裕。所以民间组织负起责任来，关心他们，帮助他们。她本人参加过三次活动，前两次都是到老兵家里去慰问，送给老兵钱、物品。

我想，这就是慰问老兵志愿者们的理念，很人性，很温暖，让人感到，在这个日益物质化的人世间，还存在着行善积德的美好风尚。

抗战期间，无论是黔军还是川军，离开本土奔赴抗日前线，装备都很差，在北方的雪地里单衣单裤，饿着肚子，穿着草鞋甚至打着赤脚，依然奋勇杀敌，血拼不退，坚苦卓绝。他们和其他抗战部队一起，用血肉为中华民族铸成了不朽的丰碑。而慰问抗战老兵的行动，把各处城市里善良的人们集合起来。抗战老兵的奉献，他们的生平和故事，与志愿者们的奉献，志愿者们的故事，交汇在一起，感动着许多人。

实际上，慰问抗战老兵的活动，也是现代人们的自我心灵净化活动，不仅给老兵送去温暖，也给

自己的内心注入一缕清新和纯净。

世风正在官风的腐蚀下日益败坏，人们啊，拯救自己吧！

2012年12月6日10时45分

焚火之后的大水井地主庄园

谭 松

在湖北省利川市柏杨坝镇的莽莽群山之中，有一个建于清道光和光绪年间的古建筑群——著名的大水井古建筑群。

2006年7月15日，我来到这个已辟为旅游景点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目睹了一群伤痕累累的古建筑，听到了一段血泪斑斑的土改史。

一、伤痕累累的古建筑

清乾隆26年（公元1761年），湖南岳州府（现岳阳县）人李廷龙、李廷凤兄弟由湘入川，落业在川东、鄂西交界的大水井。兄弟俩艰苦创业，发家致富；其后代读书耕田，人才辈出。（到清末取消科举制度，李氏前后五辈人共考取秀才七十多人，廪生十余人，举人一人，进士一人。这在一个偏僻的土家山乡，堪称空前。）至1949年，李氏家族历经了廷、祖、永、远、胜、先、宗七代人，建成了以李氏宗祠为中心，外加八个庄园的庞大建筑群。

大水井古建筑群由李氏宗祠、李亮清庄园、李盖吾庄园三部分组成。它占地2万余平方米，有房屋近300间。据说它当年“规模庞大、气势宏伟、工艺精湛、环境秀丽，为鄂渝边境古建筑之明珠。”

我先来到建筑群中的李亮清庄园。（庄园最后一个主人叫李亮清，因此称为李亮清庄园。）

站在公路边望去，一个中西合璧的大院落静卧在农田和苍翠的山峦之间，古旧的木板楼墙与白色的西式壁墙反差强烈，也算颇有特色，但没有想象中的那种“宏伟气势”。

从悬有“青莲美荫”仿石匾额的朝门进入庄园，眼前是一个青石铺就的200平方米的院坝，一条欧式柱廊横贯左右，连结两边的土家族吊脚楼。庄园共有24个天井，174间房屋，多为二层或三层楼房，设有大厅、套房、客厅、小姐房、账房、仓房、缝纫房、工匠房、磨坊等。据说，其中最具特色的是“走马转角楼”、“一柱六梁”、“一柱九梁”的建筑格局，所有建筑没用一颗铁钉，全部采用的木骨架，按“风水”、“八卦”及地理条件，环环相扣，互相依托。

然而此刻，这颗“明珠”已破败不堪，以至毫无“明珠”的感觉。乳白如玉的仿石匾额“青莲美荫”在1949年后受到破坏，被刷上石灰，周围的装饰全部被毁。当年小姐的绣楼歪歪斜斜，爬上去，已有楼板塌陷之忧；170多间房屋，大多残败破损。一间门窗均有雕花的“雅间”不知被何人长期用作厨房，那曾经精美的木雕工艺被浓浓的黑烟和油烟熏染得不忍卒读。庄园前的牌坊被拆除，屋内家具、古玩无一幸存，李廷龙的墓碑被打碎成三段，《魁山堂记》匾额被锯成几块，用来垫粮店的磅秤……在文字介绍中所说的庄园“精雕细刻的柱础，玲珑剔透的窗棂，造型奇异的廊柱，曲径通幽的走廊，

精致豪华的陈设”，如果不是为招徕游客的华美之词，则一定是庄园往日的辉煌。

在庄园的主殿里，摆放着一些老式桌椅、床、窗棂、门扇、楹联、匾额，其中大多破损残缺。据介绍，这是为了“发展旅游经济”，从四周农民家里收购来的。半个世纪前，“翻身的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撵走了或者杀死了（详见后面“血泪斑斑的土改史”）庄园的主人——地主，住进了这座豪宅，他们只住不修，又随地取材，庄园日渐衰败。待文革的革命烈火熊熊烧来，大量精美的石雕、木雕被铲除，牌坊、凉亭被拆除，书籍字画被焚毁，这颗从清朝中期就开始打造的“明珠”终于气息奄奄，神韵尽失。

李氏宗祠距李亮清庄园 200 米，建于 1846 年，这是一个小城堡式的建筑，城墙长约 400 米，高 8 米，厚 3 米，墙梯依山势逐级升高，角梯皆为整块巨石建成，依次布设枪炮孔 108 个，严密地封锁着所有的通道，可谓壁垒森严。祠堂正面东侧有口小井，周围也用巨石砌起了高高的围墙，围墙正面刻有“大水井”三字，这也正是大水井名字的来历。

宗祠的建筑模式模仿成都文殊院，主体是三个大殿（前殿、拜殿、正殿——即“祖宗殿”），四排厢房，有 6 个天井、60 多间房屋。三大殿是教化族人、祭祀祖先，商讨族务的活动中心。

同李亮清庄园一样，宗祠也是满目残败破损，正门旁还残留着文革时的狂热诗句——“四海翻腾云水怒”。步入三大殿，空空荡荡唯有柱梁兀立，往日各殿拥有的许多朱底金字楹联、匾额，大多不见踪影。（唯拜殿中堂的一副木刻楹联虽被岁月洗得惨白，但字迹还依稀可辨：“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还有，拜殿的屏风墙上分别墨书着斗大的“忍”、“耐”二字，下面分别设置了“廉泉井”和“让水池”，喻示家族的清廉礼让。）与祠堂内其它破败不堪的建筑相比，三大殿还保存了一个颇有气势的大架子，可以让人想象它当年的风韵和气派，尤其是残留在檐柱间的十余个扇形穿插枋，其雕刻十分精美，透射出浓郁的文化和艺术美感。厢房的破损更为严重，看上去也更凄荒，那一个个沉于房基之下的天井十分独特，配上两头的雕花窗棂和头顶上的屋檐，别有一番韵味，可惜天井里荒草萋萋野藤蔓蔓，消解了它应有的儒雅灵秀。

为了开发旅游，一个修复李家宗祠的工程队已经进驻祠堂，一群民工正在大殿里敲打搅拌。地上，堆着一排排十分粗糙的石木雕刻——一看就是那种缺少文化更缺少敬虔的“批量产品”。

为“旅游经济”而修复的古建筑还会有那种传统文化的古韵和玲珑剔透的工艺吗？

李盖五是李氏家族最后一任族长，他的庄园座落于群山环抱的高仰台，由于距离较远且天色已晚，因此未去探望。据说他的庄园占地 2000 余平方米，有房屋 40 余间，其建筑特色，雕刻工艺丝毫不亚于与之遥相对应的大水井。

二、血泪斑斑的土改史

1949 年，共产党来了！

李氏家族的辉煌轰然崩塌，满箱的契约焚毁了；所有的财产收缴了；整屋的书籍烧成了肥田的纸灰；偌大的庄园被分而食之，住进了新的主人……最不幸的是那些大小地主们，他们或被杀、或被饿死、或被斗打、或被烧烤……

50 多年后（2006 年 7 月），我在利川市找到了当年的土改民兵、《大水井李氏宗祠及庄园历史

写真》一书的作者向贤早老先生，聆听了一段血泪斑斑的家族史。

讲述人：向贤早

（土改时大水井农会材料干事和民兵，李亮清家佃户，1933年生）

我的曾祖父曾经担任过大水井李氏家族的帐房，他给我讲了不少关于李氏家族的事，我自小与李亮清家的小姐少爷很熟悉。土改时我在农会作干事，也是民兵，做了一些工作，如在龙门没收大小地主的五大财产，参加过斗地主等。

李亮清后人的命运

李亮清是个能干人，家业在他手里一步步发达，拥有了4000多亩田地，还在奉节城买了一个绸缎铺，在云阳买了两个盐井。当时，李亮清庄园里每天有近百人进餐。李亮清活得不长，只活了56岁，在解放前一年，1948年去世了。（幸亏去世了！）

说一下解放后他子女的遭遇吧。

李亮清共有三个儿子，九个女儿。他的大儿叫李蔚廷，他是挨的第一炮（枪），就在大水井操坝打的。问他有没得金银，他说没得了，我修房子，用完了。罚他的款，他交不出来，就把他枪毙了。

打李亮清的大儿媳妇刘温贤（也就是李蔚廷的老婆）我也是亲眼见到的。先是呼口号：“打倒刘温贤”、“刘温贤老妖精”、“砍倒大树有柴烧”等等。然后把她拉出来，把衣服裤子全部扒光，一丝不挂，人们涌上去一阵痛打，就在李家祠堂前打的，打得惨，但是没有打死，好半天她还睡在地上“呼噜”“呼噜”地哼。后来刘温贤被枪毙了。

李亮清的二儿叫李次候，他曾是胡宗南的警卫队长，解放后他逃走了，他有很多朋友帮他，东躲西藏，从一个地方流浪到另一个地方，他2002年才去世。但是他留在乡下的老婆彭吉珍受了很多罪，待会我给你讲。

（注：田赤、方国剑、孙孺著的《大水井古建筑群》一书中说，李次候毕业于国民党中央大学，曾在重庆渣滓洞主管无线电通信，解放后坐过一段时间的监牢，出狱后到新疆的一个电台工作。）

李亮清的三儿李询尧还是个学生，他被吊起来逼问金银，他受不了刑，就说有金银，埋在哪个点，明天一早带他们去挖。实际上他没有金银，第二天过不了关。夜里他翻墙逃跑，民兵发现了在后面紧追，李询尧从楼上摔下去，头摔在石板上，当场摔死了。

李亮清的女儿也被弄来斗。八小姐李先信被吊在中梁上追问金银，正在这时奉节县的杨县长来了，他说：“你们不斗当家的斗学生？（八小姐）这种人应当把她瓦解过来。”这下才免了他女儿们的罪。

李亮清的坟被挖开，他衣服还是好的，头上有个顶子，外面抹了点金，剖开里面是木渣渣。

农民斗地主还是积极，一是想当干部，二是想分地主的财产，三是斗倒地主不交租。当时还有一个“焚约大会”，所有地主、农民都来，那真是热火朝天。会场上挂着标语：“要回农民的血汗”。地主装文约（契约）的箱子全部端来，农会主席一个一个地问：“你是不是地主？”他问到杨田坝的地主李银州（音）时，李很有礼节，他双膝跪下说：“我家有500石租，算个老大地主。”“农会主席说：”那就把你的文约拿出来。”

李从箱中取出文约，有一尺多厚。

李亮清的文约有三箱子，是他家小姐拿出来的。当天当众烧毁地主所有的文约，烧得满坝子都是香味！为啥？文约上盖得有政府的印章，那印泥里掺得有银珠和香片，所以烧起来香味扑鼻。

土改时折磨地主的刑罚多得很，我亲眼见到的有这些：

一、吊半边猪——把一只手和一只脚捆在一起吊起来。

二、抬穿心杠子——把手脚捆起来，用杠子从中间穿过去，抬起来摇晃。

三、骑洋马儿——用两个长板凳一正一反重迭，将受刑人的两个大拇指夹在两个板凳中间，受刑者坐在板凳上压自己的拇指。

四、吊鸭儿凫水——将人反捆起来悬空吊。

五、猴儿扳桩——将两个大拇指用麻绳紧紧捆在一起，中间强行嵌入一根木棍，用锤子将木棍一下一下打入拇指间。

六、挂尿桶加纸木灰——把半桶尿挂在受刑人颈子上悬在胸前，受刑人头啄（垂）下来脸冲着尿桶，然后把一大堆烧过的纸木灰猛地一下倾入尿桶中，纸木灰“轰”地一声冲起来扑得地主满嘴满脸。

七、喂羊屎——羊屎干了看上去就象鸦片颗粒，把羊屎塞入地主嘴里，强迫地主吃下去——专门整吃过鸦片的地主。

但是，我见过的最惨的刑罚我叫不出名字。

那一天逼地主李亮清的二儿媳妇彭吉珍交出金银，彭吉珍交不出来，那个民兵把四块砖头烧红了，把彭吉珍衣服扒了，强迫她双膝跪在两块烫砖上，双手撑在两块砖头上，象狗一样趴跪着。然后把一盆火笼——里面烧的炭火——放到彭吉珍的乳房和肚皮下。我在旁边亲眼见到，烤得那个奶子和肚皮往下滴油！人人都是父母所生。我不是地主，我不怕人说我包庇她，我转身就出去找李金斗，他是区长。我对他说：“遭了也，今天有个地主恐怕要死在那个火坑上，已经烤得滴油了。”

李金斗走进彭吉珍受刑的屋子，叫民兵都出去，然后把彭拉起来，问她：“你到底还有没得金银？”彭吉珍说：“没得了呀，修了房子，又买了地，没得了呀。”李金斗给她一家人开了一担谷子的条子，把她们弄到李子坳去劳动，彭吉珍这才捡了条命。今年三月她家八妹还对我说：“伤透了心哟，晚上跟她睡觉，她喔火连天地惨叫，一个肚子烂得糊僚僚（血肉模糊）的，奶子都烂落完了。”

彭吉珍前年在奉节去世了，烤她那个民兵还在，叫许定胜（音）。

李氏家族最后一任族长的命运

李氏家族里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叫李盖五，他是李氏家族最后一任族长。

民国时期，连年战乱，各种各样的武装、土匪兴风作浪，到处烧、杀、抢、掠，老百姓苦不堪言。（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川、鄂两省边境上就有势力较大的匪帮贺国祥、利川境内的“神兵”等。这些兵匪们杀人放火，为非作歹，老百姓深恶痛绝。

李盖五出生于望族书香门第，很有才华，他能言善辩，生性胆大。他同贺国祥、同“神兵”交战，也打其他土匪，打出了威风，土匪们一般不敢骚扰大水井，因此，可以说李盖五保了一方平安。李盖五1930年当了奉节四区区长，1935年当了奉节县团务委员长。（当时大水井所在的柏杨镇属于奉节县，1953年才划归湖北利川。）

（《大水井古建筑群》书中说：末代族长李盖五是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其经历之曲折，是小说家也难于想象的。由于李盖五是开明绅士，解放后又主动交出财产，因此进驻大水井的工作队领导汪华源、李金斗很快与李盖五交上朋友。）

解放后，李盖五很为共产党做了几件大事。

1950年2月10日，奉节县高甲乡的大地主王学初联络奉节江南各乡，还有云阳、利川各乡的反动头目，策划反革命暴乱。3月12日，高甲乡倒龙湾最先暴乱，仅仅4天就蔓延到江南的19个乡，人数达到3000多人，杀了奉节县副县长韩广民等干部6人。3月16日，他们与李氏家族的李汶舟等取得联系，指使李汶舟去给李盖五作工作，邀请李盖五出来领头。李盖五深明大义，大骂李汶舟：“胡闹！蒋介石几百万军队都被打垮了，你这几个人，几条土枪成得了事？！”

李汶舟等人走后，李盖五将他们的阴谋报告了中共柏杨区委书记王书琴。区委先下手为强，立即调动部队，将准备暴乱的分子一网打尽，使当地又避免了一场劫难。

后来江南暴乱的土匪也被肃清，王学初被抓住后枪毙。

李盖五还救过共产党的韩副县长。那是1950年，韩副县长、李盖五一行四人由吐祥乡去奉节开会。走到亮风台时，突然从山上冲下来一群土匪，为首的大叫：“谁是韩副县长？”韩说：“我是。”李盖五赶紧向前，高声说：“我是！”只见土匪大刀一挥砍来，李盖五举刀相迎，同时大声吼道：“你们是猪的槽头血作痒，想找死？！蒋介石几百万军队都被打垮了。你们赶快回去搞生产。不要胡闹。这是共产党的干部，给你们穷人办好事的干部。”

土匪们听了他的话，一个一个的溜了。

李盖五不仅帮共产党，还同共产党的土改干部联姻。他作媒把他叔伯兄弟李问州的女儿李先兴嫁给李金斗。李金斗是从山东来的干部，在我们那儿当区长，他来了之后，把他老婆离了，另娶了李问州的女儿。

李盖五为什么要作这个媒？他想结交共产党的区长，保大水井的清宁平安。

由于李盖五有功于共产党，所以共产党打算免他的死，于是把他弄到奉节的安坪乡去帮助搞土改，算是躲起来，避开家乡的清匪反霸斗地主。但是，李盖五名声太大，大水井农会（主席叫王道玉）说李盖五是大地主，非要把他弄回来斗。他们三次向奉节县政府要人。共产党虽然想免他的死，但又不愿受到群众反对，于是就把他交了出来。不过他们要求：一、不得捆绑吊打；二、不准枪毙。

李盖五被押回来后，关在他家的一个粮仓里，没有枪毙他，但是，七天七夜不给他饭吃！他饿得把残留在碓子（一种舂米的用具）里的一点生包谷米都抠出来吃光了，没水喝，渴得喝自己的尿。

在临死的那天凌晨，他悄悄把仓板拆下来，探出去拖看押他的民兵的枪。民兵惊醒了，问他：“你拖枪干啥？”

李说：“我……我拖枪打人。”

“你打哪个？”

“我……我看得起哪个打哪个。你们这……这些家伙，不是老子保一方平安，要撵得你们鸡飞狗走。老子死……死了之后，也要在鬼门关等……等你们。”

李盖五说完就死了。

民兵汇报上去，农会中有信迷信的，感到害怕，于是决定焚尸。他们用桐油、菜油，就在他庄院门口，架起干柴烧，最后整个人烧得只剩下碗大一块，丢在庄院后的水沟里。所以后来他儿子李先伟（音）清明回来扫墓，只有在水沟边挂青（祭祀）。

共产党区长李金斗的命运

李金斗是区长，权力很大，审判地主他当庭长坐在前头，两边各坐一个陪审员，地主跪成一排，要杀哪一个就喊某某人入庭，入庭后只有几句话就完事。枪毙李蔚廷时，李金斗就是这么几句话：“农民弟兄们，大斗、小斗、加紧斗、使劲斗。斗不出来，交给我们法庭，判他的罪，杀他的头！”接着把李蔚廷抓来问：“你当乡长，抓了好多壮丁？掀了好多人下龙桥河？”我记得李蔚廷还答了两句：“我没有掀人下龙桥河呀。”

后来要枪毙李问州，也就是他的岳父，专门叫李金斗去执行。政府要观察他，看他是不是同地主睡一头。那时，哪怕你是区长县长，只要同情地主就要遭撤职。审判枪毙李问州那天我在场，李金斗问：“你当乡长，派款子、抓壮丁，杀害了多少农民？”李问州回答：“区长（他还是喊的区长，没有提女婿），我没有杀农民。”我记得他还说：“区长，我（死后）要求弄回去埋。”

枪毙打的李问州的脑壳，打得脑花到处散起。

印象最深的是李问州的女儿李先兴，也就是李金斗的新婚妻子，当时也在场，她眼泪双双直往下滚。

不过最后还是同意把李问州弄回去埋，就埋在羊角坝。

那天只打了李问州一个，一个大会只搞（杀）一个，牢里头关满了地主，就关在大院里，有几十个，要杀哪个拖出来杀就是。我们这一带有 48 户大小地主，光收缴的铺盖就是 200 多床。

李沛东是龙门乡公所的调解委员，李盖五的弟弟，他没得一点罪恶，但是，那时是只准错杀一千，不准放走一个，于是把他也抓来杀了，就在水井枪毙的。

李家土改被打死的地主有李鸿钧、李沛东、李问州、李蔚廷、李沛诚等，大概近 10 个吧。

李汉州（音）的儿子李炼梧（音）被抓来用烙铁在他脸上烙些疤子，第二天他满脸流脓地被抓到刑场上去陪杀场，不过没有杀他，因为他还是一个十多岁的学生，记得当时有政策，学生娃不杀。

李金斗大义灭了亲，但并没有保住他的官职，因为他毕竟娶了地主的女儿。他老婆刚生了第一个娃儿，上面就责令他好好反省，于是他给娃儿取名“李反省”。后来又生了第二个娃，上面把他撤了职，弄到山脚坎去当工人。他干脆给第二个娃取名“李撤职”。

由于向老先生马上要动手术，八点半便开始输液，只得匆匆结束采访，李氏家庭族中一个重要人物李孟洋未能详尽了解，老人只是说：“李孟洋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医学博士，他有很多书，土改时全部被农民烧了。”我回来后，细读田赤、方国剑、孙孺著的《大水井古建筑群》一书，从中找出了关于李孟洋的部分——

大水井著名学士李孟洋的命运

李孟洋 1884 年生于李氏八大庄园之一的洋沱坝庄园（位于李氏宗祠下面 10 多里，有房屋 100

多间，据向贤早老人介绍，在李氏八大庄园建筑中，洋沱坝的雕饰最为丰富）。1904年，他自费到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医学，并一度参加了同盟会，结识了秋瑾、熊克武等著名人士。

李孟洋回国后，曾在好友熊克武（曾任四川督军）的力邀下出任四川省第一届议员，但他很快厌倦了官场，弃官归隐。李孟洋回乡后，诗书自娱，著有《扶桑求学记》、《婴育学》、《廉溪诗钞》、《廉溪杂议》等。

李孟洋极富同情心，为当地人办了不少好事。据说，有一年春节，大雪纷飞，李孟洋发现屋前有一个女乞丐躺在树下，即将临盆。他急忙吩咐家人打扫房间，生起火炉，然后亲自把乞丐请入屋内，为其接生。这一下在族内引起风波，因为当地风俗，不能让别人在屋里生小孩，否则会带走主人的财运，何况那人还是一个脏兮兮的乞丐。族中很多人都来劝阻。李孟洋大为生气，对他们说：要败家就败我这一家，要死人就死我一个人！决不牵连你们。

在李孟洋的精心护理下，女乞丐顺利产下一子，满月后，乞丐执意要走，李孟洋又送了她许多衣物、食品。

九一八事件后，李孟洋对日本极其痛恨，儿孙辈有想从他学日语的，他即大声呵斥。

李孟洋曾四处收集珍本善本，收藏有大量的各种书画，每年夏天，他都要请20多个人帮他晒书。他结交的夔州府中学堂洋教习丰田少太郎（日本人，曾在中国生活30多年）曾为李孟洋书斋题写：“橱有中西百万卷奇书”。

1951年土改时，这些书被收缴起来，找来10个人专门焚烧，每天烧几个小时，烧了半年才烧完。焚烧后的书灰，堆满了一块田，农民都说书灰是肥田的上等肥料。

据李孟洋后人介绍，李孟洋留学归来时，篋中有一幅20多丈长的白绘绫书画长卷，上面全是当时留学日本的近百名友好的诗文，第一首诗就是秋瑾亲笔书写的古风作品。这幅珍贵的书画长卷也在土改时被毁了。

土改时，李孟洋的家业已败，但有人说李孟洋从日本回来时带有70箱金子，于是逼他交出来，天天组织斗争，李孟洋不久就在斗争中去世。李孟洋死于1951年，享年66岁。

（如何逼交金银？如何组织斗争？李孟洋如何“在斗争中去世”？该书作者没有交待，想必也不敢交待，只有让我们去想象。）

采访时间：2006年7月16日

地 点：湖北省利川市人民医院住院部8楼

记 录：谭 松

采访后记

2003年3月，我在三峡库区采访时就听说湖北利川有一个叫“大水井”的大地主庄园。根据经验，有地主庄园的地方，一定有土改的血腥，心里，便暗暗埋下了前去采访的愿望。但是，直到三年后我才动身前往。

可惜，我来晚了，遭受烧烤酷刑的彭吉珍老人在两年前去世了，再也无法倾听一个苦难女人的经

历。庆幸的是，我在利川人民医院找到了向贤早老人，并赶在他动手术前采访了他。

向贤早老人记忆清晰，他不仅小时经常同庄园里的小姐少爷们一块玩耍、不仅当过土改民兵，亲身经历了整个土改，而且前些年还专程到李氏的八大庄园考查，走访了当地的老农和李氏后裔（正因为如此，他写出了《大水井——李氏宗祠及庄园历史写真》一书）。遗憾的是，时间太短，对大水井如此复杂而厚重的历史，没有长夜畅谈，多方了解，肯定会遗漏许多重要情节。还有，向先生收集的不少有关李氏家族的老照片我一张也未能目睹。

眼下，也只有暂时如此了。

返回的路上，我在横跨渝鄂的七曜山上停下来。回眸望去，利川大地，山峦起伏，苍翠满目，风光十分秀美——多么让人难以离去的土地！

反右运动 55 周年祭

雷崇功

55 年前初夏的燥热，我还记忆犹新。许多人也许淡忘了，我相信，历史不会得健忘症。

1957 年的反右运动，半个世纪了，是否该有个公正结论呢？难道要等到百年忌辰？

1980 年 6 月 11 日，中共中央在《通知》中批判了“持全盘否定的态度”，强调：“反右派斗争……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引自叶永烈《反右派始末》）邓小平说：“1957 年的反右本身没有错，问题是扩大化了。”（《邓选》207 页）

怎么判断一个运动的对与错呢？还是让数字说话吧。这次运动正式戴帽 55 万多人（一说 300 多万），据说不予改正维持原案的只有五人（一说 96 人），“扩大”了 11 万倍。这还能说“正确”吗？比封建社会的株连九族又“扩大”了多少倍？真是亘古奇闻！

为了证明“正确”，留下五顶帽子。其中有举世闻名的章伯钧、罗隆基，不过，也给他们开了追悼会，事实上已平反。钦定的罪名“章罗联盟”是莫须有的，已完全推翻，只是不像 50 年前那样轰轰烈烈地宣布罢了。其他三个人的言行也没有什么错，不知为什么“不予改正”？不见谁解答。储安平的“党天下”错在哪里？犯了龙颜就永世不得超生？这个根本性的症结，危害了中国 60 多年，一党专政就不会有政治民主，更说不上民权了。这五人与“改正”了的人的言行有什么本质不同？留下五顶帽子真能维系运动的“正确”吗？这种维系值得吗？对谁有利呢？

邓小平说：“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领导，扭转社会主义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邓选》258 页）是的，1956—1957 年确有一股民主风潮，广大群众尤其是知识分子对逐渐显露的一党专政独裁统治已有许多不满，民主的愿望只作了谨小慎微的些许表露，就触到了执政党的痛处，于是出现了空前的大冤案。

人民要求民主是天经地义的。国民党统治时期，广大人民尤其是青年学生在共产党的组织和鼓动下掀起一次次争民主、争自由的学潮、工潮，但曾几何时，当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尽管仍标榜着民主、自由，但哪里容得下一丝民主的清风！毛泽东说，民主是手段，专政才是目的，一语道破了天机。利用民主这手段推翻了国民党政权，就又怕被“民主”推翻，在公开的、被邀请的会上“和风细雨”地提提意见，就以为“黑云压城”了。独裁者其实心理脆弱得很，恐惧得草木皆兵，只有加强禁锢，加强镇压，连手无寸铁的书生甚至一二十岁的学生娃娃也视为天兵天将，决不放过。毛泽东说：“秦始皇算得什么！”是的，坑 460 个儒不够大气，1957 年这一次就网下几百万人，闹共产 90 年来多少无辜的生命，才成就了这个“千古一帝”。

以言定罪古已有之，“文字狱”遭千古唾骂。从《野百合花》、《武训传》、“胡风集团”到反右，一步步升级、扩大，标榜的言论自由、言者无罪的遮羞布已荡然无存。却不过“盛情”帮党整风，善意提点意见，哪知就中了“阳谋”，被打下十八层地狱。范围之大，危害之深，影响之长远，简直无法估量。它为以后的反右倾、文化大革命开了先河，造成了民族、国家的深重灾难，将来的史书上肯定会大书特书一笔。这么折腾来折腾去的结果是大地疮痍，黎民遭殃，经济濒临崩溃，中华民族固有的传统美德遭到无情的践踏，诚实、信义、坦率、人道、人性、人情遭到抛弃，虚假、冷漠、腐败、倾轧、恶劣的社会风气恐怕再是半个世纪也难以扭转。这个恶果有识之士不会见不到吧。

“改正”二字，算个伟大发明，汉语的词汇太丰富了。它与“甄别”有何不同？甄别是对少数而言，55 万多人还是少数吗？为什么不能用“平反”呢？“错划”则是不承认这个运动的反人类性质，“对划”就应该吗？

反胡风、反右倾、文化大革命等都全盘否定了，为什么单单这个运动的全盘否定就这么难？障碍在哪里？据说当年胡耀邦等主张彻底为右派平反，但邓小平竭力捂住——有白纸黑字为证。仔细想来也不奇怪，在八届三中全会上作反右报告（悄悄从文选中抽掉，大概心虚吧）的就是此人，他是反右运动的二号策划者和领导者，中央反右运动办公室主任，像周扬、刘白羽那样公开认错、请罪，不是他的风格，他决不可能“立地成佛”。他说：“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也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邓选》277 页）只承认是积极分子，说到责任，加个“也”字，加个“呀”，多么轻描淡写，实际上“扩大化”他的“功劳”大大的。把几百万人打下地狱的罪魁仍然当政，自然就不准翻案了。毛泽东从富田事变、延安整风到整胡风、大跃进、反右、反右倾、文化大革命等一连串罪责得不到清算，障碍又在哪里呢？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决不是小事。历史旧账的清理，是为了更好的前进，是为了全国人民心情舒畅，是创建和谐社会的必要前提。胡哥上台后提倡“和谐”，人们寄予了莫大的希望，希望反右运动有个正确的结论，因为他当时还是中学生，不会是那场悲剧的制造者吧。中国人总是盼清官和好皇帝，这无可厚非。查其言，观其行。看到对“思想”、“理论”、“代表”那样推崇，60 大庆的四个方阵充分表明了政治态度，反右运动这道坎迈不过去，许多历史旧账得不到清理，和谐就无从谈起。制约社会发展的瓶颈——政治改革，先太上皇许了 20 多年的愿，仍不见动静，要取信于民恐怕就难了。当局这一“代”已进入倒计时，说的再好听恐怕也难逗起民众的期待了。

当今社会的禁忌很多，岂只这个反右，六四、法轮功的淋淋鲜血尚在全国人民的心中流淌，也不准议论，流落海外的民*人士有国难投，有家难归。就连已全盘否定了的文化大革命也不能探讨其深层根源。再上溯，红军时期的富田事变、延安整风、50年代的土改、镇反、肃反、思想改造、反胡风、大跃进等一系列多如牛毛的政治运动，都是一错再错，一冤再冤，共党从来没有道过歉。大右派储安平说得好，“党天下”是一切罪过的总根源。“民主自由”只是块遮羞布，从来没有实行过。“联合政府”倒是摆过样子，有几个非共党人士当过副主席、副总理和部长，但不几年就全部被赶下台，任何单位（包括民主党派！）都是共党主政，前几年卫生部新任命一位非党部长，报上大吹特吹，也难怪，自从章伯钧等被罢免后半世纪以来可能是特例，不管有没有实权，也是值得鼓吹的。从中央到基层的官员哪一个不是层层指定的中共人士，要当官就得先入党，不谋官位还入什么党？这样亲自挑选、培养、传位的接班人自然会忠于这个体制，忠于这个特权阶级。

邓小平说1957年的右派“杀气腾腾”，这是活天冤枉。那时的右派非常谦恭小心，有枪杆子作后盾的独裁者才真正“杀气腾腾”，反右才真正“黑云压城城欲摧”。其实反右运动在广大人民心目中早已全盘否定，邓小平和他的继承人的理论不值一驳，他们自己恐怕也不会相信，只是怕揭露自己刽子手真面目罢了。不偿还历史欠债，不改革政治体制，真能“和谐稳定”吗？恐怕只有万马齐喑和民怨沸腾的局面吧。

这半个多世纪，共产党作了些什么？老百姓过得怎样？用“水深火热”来形容前三十多年不过分吧。后三十多年人民生活有一些好转，但专制独裁的体制没有改变，虚假、腐败成了社会的痼疾，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只消看看党使哪些人“先富起来”就清楚了。几代继承者对毛泽东欠下的老债无意偿还，还口口声声继承“思想”，又新欠许多债——其中有血债。中国老百姓忍耐力太好，容忍其维持了60多年；当然，还有枪杆子的威力和高超统治术的作用。苏东巨变是民主的胜利，是大势所趋，暴力社会主义统治的国家在世界上已所剩无几，早已日薄西山。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虚幻的幌子，掩盖着封建专制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实质，全世界人民逐渐看清了。时代在前进，专制独裁终会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

十五年前，王彬彬说：“当它60周年、80周年、100周年的时候，人们一定会加倍地记起它。”（《五十五万顶帽子与四十年》——1997.9.19《中国经济时报》）历史——公正的裁判员，决不会屈从于什么伟人的意志和高论，把历史当作玩笑的人不受到公正的裁判才怪呢！

这55万人，许多已作古，幸存的都已年逾古稀，只有几个愿望：

- 1、希望有生之年看到公正的结论，要求解密反右档案；
- 2、右派们不屈不挠，争取彻底平反，行使索赔的权利，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要求共党公开认错、道歉和赔偿；
- 3、争取建立文革博物馆、反右博物馆，从现在起收集材料，写回忆录和研讨文章，必要时可交流和座谈，行使结社、集会的权利；
- 4、幸存的右派健康长寿，有时间、有精力拭目当局下一步、下若干步如何动作，相信历史是公正的裁判官。

右派大学生民主思想的形成

陶渭熊

在 1957 年反右运动所划的右派分子队伍中，右派大学生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全国的右派大学生有多少？有文章说是 20745 人，该文还公布高校右派教职工有 36428 人。这个数字叫人生疑，因为大家都知道，右派学生比右派教职工多得多。倒是铁流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全国右派大学生有 5 万到 8 万人的估计比较接近真实，因为高校划定的右派学生都占该校学生人数的 5% 以上，而当时全国的大学生有 100 万。

这些右派大学生的特点是，思想活跃，思维敏捷，具有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关心国家大事，忧国忧民，向往自由民主，痛恨专制集权……在 1957 年的整风运动和大鸣大放之中，他们把斗争矛头直指专制主义。虽然后来他们失败了，一个个遭到专制暴政的残酷镇压，有的甚至惨遭杀戮，但是他们高举的旗帜和高扬的精神，却是自由民主的榜样而永垂史册！

当我们回顾这一群体的时候，我们注意到，二三年后的大学生，面对饿殍盈野，全民饥荒自己也饥饿浮肿的严酷现实，却几乎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民请命，对大饥荒的制造者说一声不；而九年后的大学校园里，那些手举小红书高喊造反有理的大学生，则完全沦落为专制政权的奴仆与工具而助纣为虐！和这样的大学生相比，右派大学生们反抗专制暴政的精神，可以说是与日月同辉。

那么，我们要问，右派大学生的民主自由思想是如何形成的？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应研究这些学生成长的时代背景。

当时，这批学生大多 20 岁左右，小的 18、19 岁，更大一些的调干生则 30 岁左右。他们出生于上世纪 20 年代末至 30 年代末。也就是说，1949 年全国被“解放”时，他们中最小的已有十岁，完成了小学学业，多数正在读初中或者高中。他们接受过祖国的传统文化教育，国民政府的公民教育，五四思想教育，和“解放”后的红色文化教育，这些教育铸造了他们的民主自由思想和独立的人格个性。

传统文化的熏陶

每个人都生活在传统之中，其思想言行都要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和制约。中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多样而又博大精深，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知识群体和杰出人物，是中华民族的灵魂，也是中华民族繁衍生息而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传统文化氛围在家庭、学校和社会上还相当的浓厚。那时的学生，不管出身书香门第还是寻常百姓，都离不开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以北大右派学生为例：燕遯符上小学之前就在父亲督导下背诵诗经、春秋，王书瑶从小就受到《东周列国志》和儒家民本思想的影响，张景中上小学前就在祖母督导下学习《古文观止》（见《若干北大学生右派的文化遗产与意识的形成》）；至于古典文学如诗歌散文，历史文献等，凡适于学生学习的，都是那个时代所有学生的必修内容。

优秀传统文化，主要包括儒家思想中一些积极的内容和历朝历代士大夫优良品德的言行记载。这些内

容对于学生的思想言行有作非常深刻的影响。比如儒家的民本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得民心者昌，失民心者亡”，“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等，可以说为学生民主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士大夫情怀，使学生们自小就具有忧国忧民，关心国家大事，以天下为己任的良好品德。一些优秀的历史人物，如司马迁的秉笔直书，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海瑞的为民请命，包公的不畏权势，文天祥的凛然正气……等，使学生们具有疾恶如仇，刚正不阿，直言敢谏、光明磊落的正义感和抗暴精神，甚至于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像林昭那样“宁为玉碎，以殉中华”。年青的右派大学生们，正是在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下成长起来的。

公民意识的形成

国民政府虽然在中国大陆仅存在了 38 年，虽然 38 年都是在内忧外患与连年战乱中艰难支撑，但它却是中国自秦皇以来两千年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不喊皇上万岁的时代；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拥抱自由民主的时代（虽然民主自由还有多少之忧，但绝无有无之患）。它是一个开放的时代，是一个具有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时代，也是一个大师辈出的时代！它的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以及新闻、出版自由。导致中国的思想启蒙和文艺复兴，涌现了胡适、鲁迅、陈独秀等一批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它实施的教育制度，奠定了我国现代教育的基础，在短短的 38 年中绽开出灿烂的花朵，结出丰硕的果实：它培养了后来的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李正道，以及更多的知名科学家、大师、学者、学科奠基人、带头人。它所实施的基础教育——国民教育，是时至今日我们还无法企及的高峰。当国人经过 60 多年“教育革命”的折腾之后，再翻开当时的《国语课本》、《国文教科书》时，竟惊奇地发现，那些曾经被我们斥之为“反动”、弃之如蔽屣的东西，竟是铸造人的灵魂和人格的瑰宝而将其抢购一空，以至於一册难求：它没有党派利益的洗脑，没有意识形态的灌输，没有为“真理”、“主义”而奋斗之类的说教，没有至高无上的救世主……；有的仅是生活常识、礼仪常识、社会常识、做人的常识，以及其中蕴含的博爱、平等、自由、民主思想。

国民教育中的公民课，讲授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这些现代政治学常识。而公民的权利，不是课堂上的空洞说教，不是自欺欺人掩人耳目从不履行的装饰品，而是可以落实在行动上的社会实践。例如游行示威权利，那个时候的大中小学生，谁没有参加过“反饥饿，反内战”之类的示威游行？就连远在偏僻乡镇的笔者，10 岁时，也被地下党老师组织起来游行示威，呼喊“王灵官，垮垮垮！”（王灵官指当时四川省主席王陵基）；至于言论、集会、结社这些权利，只要你愿意，绝没有人请你“喝茶”，找你“谈话”，对你“关心”。这样的教育制度和社会实践，从小就培养学生自主参与，关心国事的公民意识。使他们成为具有人格独立、思想自由、社会责任的公民，而不是人格依附、政治盲从、听人使唤的臣民。右派大学生正是在这样的教育制度下完成了基础教育而奠定了他们的基本价值观和人生观的。

虽然国民政府被推翻了，但它的教育制度却是中国历史上最先进的。如果国民教育能够延续到今日，我想站在诺贝尔奖领奖台上的中国人，一定不仅仅是一把“空椅子”。

五四精神的传承

五四运动，是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五四运动高举的民主、科学的伟大旗帜，呼唤着社会民主、精神自由、思想独立、个性解放，以及对专制政权及其思想的反抗和批判。这种精神鼓舞着热血青年为实现中

国的民主自由而斗争。虽然后来五四精神已异化为一种左倾文化，但是大学生们仍然高举着民主科学的伟大旗帜。

右派大学生们感到需要用五四精神来申张自己的民主诉求，表达自己对时代的关心与思考，是在“中国人民站起来”之后的那些年代，那些一个接着一个的政治运动，把所有的人，包括年青的大学生们都卷入的年代；特别是毛泽东号召知识分子帮助共产党整风的1957年。其集中体现是1957年春夏之交发生在北京大学校园内的“5·19”民主运动。当时的学生同人刊物《〈广场〉发刊词》是这样写的：“北京大学是五四的故乡，北大儿女是五四的后裔，我们的血管里流着五四的血液，在社会主义的五四时代，我们要学会五四先辈们的大胆提问，大胆创造的精神，去争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文化。”“北大民主广场是五四举火的地方，五四先辈们曾在民主广场上集会点火与誓师高歌。”“我们的广场指向阳光下的黑暗……”“同人刊物”本来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禁止了的五四运动的传统，现在又被这些20岁左右的青年大学生重新举起，而这些高举五四精神的大学生后来几乎无一幸免于右派分子的命运，说明五四运动倡导的民主精神，确曾为右派大学生们所继承与发扬。北京大学如此，其他各地的大学生校园里，也发生过相似的过程。

红色教育中的迷茫与觉醒

新中国终于诞生了。她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100多年间多少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英勇牺牲前赴后继梦寐以求的新中国啊！中国人能不欢欣鼓舞放声歌唱山呼万岁？大家以为，从此，中国就走上了自由民主的康庄大道。

然而“新中国”给予国人带来的却是：罢黜百家独尊马列的意识形态的强制灌输，几乎排斥一切普世真理，从根本上拒绝了民主自由；分裂族群与煽动仇恨的阶级教育毁灭了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友爱平等宽容，挑动群众互相厮杀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层出不穷的整人运动制造出一批又一批的冤假错案与“阶级敌人”，在恐怖与暴力之中人人自危，提心吊胆于遭受批判斗争、逮捕法办、甚至惨遭镇压；农业合作化及统购统销政策剥夺了农民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权和对产品的支配权、享受权，严重地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民、也使全国人民长期生活在饥饿与贫困之中；思想改造运动和文化专制主义，从政治上、思想上、心灵深处摧毁了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与独立思想；篡改历史与粉饰现实的政治谎言颠覆了中国人诚实守信的传统美德；颂圣文化与救世主教育塑造了人间上帝，培养多少山呼“万岁”的盲从者和人身依附的奴仆……

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何其遥远！

那是让所有人迷茫彷徨的时代。在迷茫中，有的人沉沦，有的人随波逐流，而右派大学生们则在迷茫中觉醒。

应该说他们也曾是党、国、领袖的虔诚信徒，迷信的崇拜者，一贯正确的无条件服从者；许多人是团员、团干部、班干部、预备党员或党员。当他们发现严酷的现实与高唱的赞歌相距何只千里的时候，他们很快觉悟到自己的谬误。例如北大右派学生周大觉，出身贫农之家，深恶痛绝阶级压迫，但他发现“新的阶级压迫正在形成，惨状目不忍睹”的时候，就“要用自己的眼睛观察世界，要用自己的耳朵去倾听人民群众的欢悲哭泣。”人大右派学生林希翎受派遣到西北地区调查，看到中国底层社会的种种弊端，看到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农民的真实生活，“农村生活，不像《人民日报》吹牛吹的那个样子……农民生活苦得

要死”，便开始了对现实的怀疑；她看到无处不在的党权凌驾于一切之上，发出了“党大还是法大”的呼号。北大右派学生刘奇弟因替胡风鸣不平被打成反革命遭受批斗关押并被绑在窗棂上，他能不对这样的制度进行思考与质疑？林昭曾经是党的好女儿，对党的忠诚超过对父母的亲情，当她的虔诚信仰被无耻的阳谋彻底粉碎时，猛然觉醒登高一呼：“我是林昭。林，双木三十六的林；昭，刀在口上的昭。刀在口上也好，刀在头上也好，今天既然来了，就不考虑刀在哪里了！”这是何等的惊天地泣鬼神！从此，她毅然决然地走向反抗专制暴政英勇献身的不归路。北大右派学生陈奉孝，在镇反运动中眼看着自己的师长、父兄被滥捕滥杀，开始了对中国革命的反思。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右派学生朱永隆发现被神化了的党，不过是一个抽象的符号，“抽象的党等于上帝”，这是他质疑党神话的名言。川大生物系右派学生冯元春通过对镇反、肃反、反胡风等运动的分析，认定毛泽东是“伪马列主义者”……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斯大林暴行的揭露，联系我国一系列政治运动无不以军警监狱对百姓进行专政的现实，引起更多的右派大学生对于社会主义、个人崇拜、集权、暴力、专政的震惊、反思和觉醒。

于是，他们高高地举起自由民主的伟大旗帜，义无反顾地指向现代专制主义！

他们热情奔放纯洁无瑕，没有个人诉求，没有功利目的，为探索真理追求光明而勇往直前！他们是一群可敬可爱的热血青年，应该成为中国的未来和希望！

然而他们太年青，太幼稚！……

在深文周纳的“阳谋”罗网和强大的专制政权面前，右派大学生们毫无防范，很快落入圈套，一个个碰撞得头破血流，等待他们的是二十多年的非人生活……

然而，虽九死其未悔。五十五年后的今天，当年的右派大学生们，许多已被迫害致死，幸存者最年青的已是七十多岁的耄耋老人，他们中的许多人仍在奔走呼号，为实现中国的民主、自由、人权、宪政而斗争。

（为反右运动 55 周年而作 2012 年 4 月 15 日完稿）

我们那一网

雷崇功

我的母校是西南师范学院（后改为西南师范大学、西南大学），1957 年反右时我们是中文系三年级乙班学生。进校时 50 人，后有转学停学的，这时只有 46 人了。这是个人才济济、朝气蓬勃的班，也是个团结的班。学校环境优美，教我们的教师有很多是学识渊博的学者，如：吴宓、孙铭勋、曹慕樊、刘又辛、杨欣安、刘兆吉、吴则虞。我们正在如饥似渴地吸取知识的乳汁，准备报效抚育我们的祖国。1957 年春天，民主的清风吹进华夏古国，吹进我们校园，大家激昂振奋，我们轻松地参加大鸣大放，文科论坛、《白丁报》、《海鸥报》等俱热气腾腾，仿佛还在玩笑似地辩论着，“阳谋”突然来到，大家都懵了。董时光、孙铭勋、曹慕樊、陈东源、罗荣梓等老师先落网，接着各班也开起了杀气腾腾的斗争会。

我班第一位被揪出的是冯孝敏老大哥，他入学前当了多年小学教导主任，知识渊博，眼光犀利。他率先抛出《胡风是反革命分子吗？》，又印发《鸣放在北大清华》，成了出头鸟。

接着揪出团支书、“志愿军叔叔”金太林，团支委、右派刊物《白丁报》副主编廖常勇和校文学社社长黄鹏先。

大家私下议论，一个班四个右派，太多了。当然还想不到右派的下场如此悲惨。

哪知这只是第一战役，更“辉煌”的战绩还在后边。

下半年全国都在欢庆反右大胜利，以为运动已圆满结束了。1958年刚开学，又叫要“深挖”，挖出向继维、邱茂棣、杨介五、周义亨、陈年高、张淮明、彭玉君和我8人。共12名，占全班1/4强。如果加上开除团籍（大概是中右，未公布）和受党团处分的，约占全班1/2，如果再加上受批判作检查的，恐怕剩不下十个“好人”了。

我们中文系这个年级有两个班，甲班与我们旗鼓相当，也是12个右派，大概是不偏不倚下达的指标，一碗水端平吧。我们学校的右派据说有800（一说700）多人，未公布，不知是不是还在保密，我校当时师生员工总计4000多人，右派至少超过15%，反正在高校里按比例是首屈一指，超过北大和川大，是重灾区。我班又是重中之重。我校的官员多是西南局下来的，党委正副书记张永青和王逐萍都是邓小平、李井泉的老部下，不懂教育，却擅长斗争，挤走了有真才实学的谢立惠院长，还想在毛、邓面前立大功，因此左得出奇。

我班的反右司令是白伟，南下干部，党支部书记，学习一塌糊涂，整人却很卖力。她的丈夫被划为右派分子，她立即离婚，划清界限，又怕上级不信任，就竭力表现，立功心切，心狠手辣，我班成为重灾区与她有很大关系。她一生并不顺利，没有教过书，毕业后在计生委工作，家庭也不幸。上世纪末她对毛政权有所认识，说自己受骗了，但至死没有向大家道歉，没有透露反右内幕。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但那些日子永远不会忘怀，许多事仿佛就发生在昨天。最激烈的一次是在大礼堂，才从美国归来的董时光先生正在作精彩讲演，全场掌声雷动，中文系四年级学生刘扬烈突然跳上台去夺话筒，一边声嘶力竭地叫：“不准董时光放毒！”会场秩序大乱，金太林和另外几个同学上去制止，把刘扬烈赶下了台。这也是金大哥一大罪状。刘扬烈则成反右英雄，编辑左派刊物《群众报》，在反右时杀气腾腾，天天点名批判右派，煽风点火。原来他有后台——中文系党总支和教师党支部在幕后出谋划策，他的准老婆刘建芬是党员，他则在前台表演。老毛的“阳谋”他早知道，抓住了千载难逢的机会，成为了名人。后来果然火线入党、夫妻双双留校、评教授，虽然他实习时做小偷尽人皆知，可以说是“有口皆碑”。母校50校庆时，我在食堂吃饭时碰见刘扬烈，他微笑着问我：“还认得我吗？”尽管他已面目全非，更无当年气焰，我仍然说：“化成灰也认得！”

对1958年的“补课”我记忆特别深刻。第一位被揪出的是向继维，他出身好，一表人才，成绩优良，常钻研民间文学和古典文学，但不问政治，团也不入，又正在谈恋爱，因此很少参加鸣放会，偶然来一次也从不发言。在斗争会上，有人一开始就把他的恋爱纠葛突然摆出来讲，大家有些莫名其妙。原来他追求的是个预备党员，据说她去医院检查，还是处女。他却被定为“品德败坏”，戴上右派分子和坏分子两顶帽子，立即开除学籍，押回蒲江老家。既然她守身如玉，他们没有性关系，他怎

么成了坏分子？两天的斗争会没有揭发出他一点右派言论，仅据正当的私生活定为右派更是荒唐，荒唐岁月的荒唐事太多了。个人隐私对“看客”富有吸引力，生活作风问题最容易将人搞臭。从这里开始反右补课，不知是哪位高人设计，估计白伟还没有如此水平。以后他的遭遇很悲惨，因为企图偷渡出境，曾作为反革命分子被押解到青海劳教三年多，跑回四川后也只有东躲西藏，好在他在难中遇到一位识珠女子，白头偕老，晚年还幸福。

1962年我在剑门关回想起那荒唐可笑的斗争会，特别浮现起在会上有人星沫四溅大讲“膜”的常识的情景，写了一首诗：

偶忆

两条道路决死活，荡荡巍巍撼日月；

慷慨陈辞发欲指，津津乐道处女膜。

第一批四人的斗争会开得很“充分”，被斗者还可以反驳、申诉，当然，东风绝对压倒西风，不管服不服，肯定定性，绝无幸免可能。也有说理的成分，如：胡风是否反革命，只需引经据典，党报怎么说，毛老人家怎么说，就够了；向个别党员提意见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夸大一点不及其余”；被斗者自我否定是“大帽子底下开小差”……时间因此拖得很长，直到斗垮斗臭。

我们第二批除了第一位向继维以外，都是草草收兵，记得我的斗争会顶多一个小时，反右领导小组宣布罪状后，只有事先安排的两三人简单发言，没有叫我说话就直接宣布戴帽，同时在食堂贴了一张大字报。没有要我当众认罪，后来处理时竟然说我态度恶劣。可能时间太紧，反右的任务又这么繁重，只好提高效率。

“补课”结束不久，学校对我们右派作了处理，分为四类：

第一类，劳动教养。据说这个无期的劳改是专门为右派开设的，沿用至今。大右派董时光老师、学生右派刘期朗、朱云隆和我们甲班的李言畏等属此类。以后董、刘、朱都升了级，正值壮年的董先生死在劳改场；

第二类，保留学籍劳动改造，我班第一批四人属此类，到北碚金刚乡劳动了几个月，1958年冬天从农村回学校劳动队；

第三类，留校察看。我班六人获此处分，毕业时我和邱茂棣继续留劳动队，可能是我们的态度特别恶劣吧；

第四类，免于处分，但“分子”是终身的。我班彭玉君和张淮明属此类。彭玉君没有任何右派言论，但《鸣放在北大清华》摘自她弟弟给她的来信，她姐弟一起落网。

老毛“宽厚”地说，右派分子是敌我矛盾，但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对右派“大部不捉，一个不杀”。这是绝大谎言，实际上右派被杀的很多，单是北大学生右派就有8人，还专门为右派设立了劳教，沿用至今。北京大学700多右派，初步统计，处死8人，打死1人，饿死6人，自杀10人，死因不明1人，劳改9人，劳教25人，其他是保留学籍监督劳动。

劳教的处所都在穷山恶水甚至荒漠，人类甚至动植物都难于生存的地方，如甘肃夹边沟劳教农场、四川峨边沙坪劳教农场、云南昭通大坪劳教农场、415劳教筑路支队以及青海高寒地区 and 新疆大沙漠

中。在那种恶劣的环境中能够活下来简直是奇迹了。夹边沟 3000 多劳教分子只有 300 多还命垂一线，如果再拖几个月，只怕要死光。青海省死亡劳教分子 4000 多，其中右派 3000 多。

这里我突然想到亲眼看见的两种动物濒死的情景：一是猫戏老鼠。猫抓住老鼠后，可能不饿或者悠闲或者心情特好，不急于吃掉，放在一两尺远的地方，等老鼠跑几步再去抓回来，如是者多次，老鼠精疲力竭，猫就等它恢复体力后再来戏耍，直到猫失去兴致后才去吃，老鼠一般是跑不掉的。二是杀鸡不断喉。杀鸡专业户大多在鸡颈上用刀轻轻抹一下，就丢在大竹罩里，鸡在里边垂死挣扎，少则几分钟，多则一个多小时，血一滴一滴地滴，滴完后才断气，断气前还要大动一两下。俗话说：“救人救到头，杀鸡杀断喉。”杀鸡不断喉是极端残忍的，正如凌迟处死，一刀一刀地割，满足刽子手和看客的嗜血本性。因此，在这种统治者眼里，多一笔血债少一笔血债都无所谓，下令开枪不会有什么犹豫，他的部下绝对服从惯了，也就认为是天经地义的金科玉律。如果不是祖龙翘辫子，黑五类全部都会像大竹罩里的鸡一样，鲜血滴尽而亡。

其实当时我们学生尽管向往自由民主的曙光，但大多很幼稚，没有鸣放出什么重磅炸弹，多是党员作风、教育弊端和课程设置等，冯大哥提的问题大一些，但也不是新创，林希翎在北京先提出来。我主要是鹦鹉学舌说“党天下”有道理，又是《白丁报》编辑，划为右派也不冤。那么多政坛元老和学界泰斗都难识其奸，我辈黄毛小子被网住也不用后悔。

中国人历来都盼望明君和清官，盼望“大救星”，虽然无可厚非，但实在糊涂。我有一位同网同学，是学识渊博的高级知识分子，被“改正”后将当年反右副总指挥的相片供在神龛上，以为他挽救了我们这伙贱民，殊不知领头反右后来又阻碍平反的正是此人，有白纸黑字为证。不切实际的幻想应该丢掉，他和他的继承人“立地成佛”也绝无可能，没有真正的民主自由，国家不会有希望，政治体制才是根本。

1958 年冬，我与从农村回来的金太林、廖常勇等二十多人组成伐木队，去壁山与铜梁交界处砍树和运树，条件很艰苦，劳动很繁重，好在大家都是棒小伙，也不惜力气，效率很高。大家都是一网之鱼，没有“人民群众”监督，觉得分外轻松。只有一位很和善厚道的老工人带队，他不会陷害人。晚上大家挤在一间屋子里睡觉，睡前至少要在黑暗中闲聊一两个钟头，那是最开心的时候，说说趣事，相互打趣，但决不说愁苦，不怨天尤人，眼前的严峻和前途的险恶似乎全不在心上，笑浪在静夜大概要传播好几公里呢。后来我填了一首词：

破阵子 赠伐木队诸君

戏跨原杉火箭，清歌鼓棹苍山。提裤东池战母狗，归来定计制沙盘，何曾话辛酸。
人在坎坷中识，同罗更是相怜。屈指西风已四度，天涯蓬转几桑田，应犹忆壁山。

1962 初夏于剑阁公兴

词中的“大战母狗”、“沙盘定计”和“坐火箭”都是当时著名的笑话，不知每天从哪儿找这么多的笑料。因言获罪以后，大家在人前只有唯唯或低头装哑，禁锢得太久的天性在这个特殊群体里释放了出来。金太林最近说，这一生最难忘、最惬意的就是在伐木队那两个月的经历。抬树时我常与金大哥一根杠子，回校后在劳动队又与邱茂棣一起打铁，因而我们结下了深厚的终生情谊。100 多

人的劳动队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下成为一个共患难的集体。

1958 年我班有五个右派与其他同学一起分配了工作，是监督改造，处境更为恶劣。彭玉君曾写信说，实在处不下去，想回西师来劳动。这当然不可能，以后她历经苦难，在她的长篇小说《梦幻三部曲》里有真实的反映。周义亨和陈年高的遭遇都很惨：周劳改十年，因摘帽右派身份加重了惩罚；陈工作四年就被开除，回老家好不容易到劳动服务站谋生，文化大革命被打成反革命批斗，开除回家务农。黄鹏先在劳动队放羊时，一支羊摔死了，他被批斗后开除学籍，送回原籍璧山监督劳动，后来流落贵州绥阳，好不容易当上小学民办教师。

我是 1959 年 11 月分配到剑阁县的，工资 32 元。大学毕业生起码薪本该 42 元，可周义亨只有 25 元，他来信说：“綦江待人何薄！”其实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右派在哪儿也不好过。不能上课，只能做勤杂工，哪儿都受到歧视和打击。1962 年我被精简回到简阳老家，穷乡僻壤也不是世外桃源。尽管老老实实劳动，大队、公社和县公安局一直在找茬，但没有安上罪名，直到文化大革命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时，我被诬为“大同党”头目，在土牢关押一年多，严刑逼供，到了体无完肤求死不得的境地。这是当时当地很轰动的大案，我成了当地的名人，牵连很大，逼死二人，多人自杀未遂，后来不了了之，既不向我们认错，也不赔偿，甚至没有宣告结案，不知项目组是否还在搜集我们的材料。我后来写的《别样的幽默》虽不愿再现严酷，但也作了一点记载。后来当了八年外流犯，屡遭危难和折磨，饱尝了人世的辛酸。与许多同网朋友一样，不愿再提往事，待心情复苏时再写吧。

邱茂棣、金太林、廖常勇在劳动队呆到 1962 年“复学”半年，作为 62 级毕业生分配了出去。尽管老邱 1959 年国庆第一批就摘了帽，但文化大革命时又重新戴上光荣的右派帽子批斗，并开除公职。其实“摘帽右派”仍是右派，许多右派摘帽后仍是专政对象，政治处境并未改善。尤其到了文化大革命，黑五类自然首当其冲，我们这一网几乎无人幸免。现在我们“改正右派”没有平反，当然还是右派。北大著名学生右派谭天荣在 1957 年反右运动高潮时宣告：“啊，右派分子——人类的傲骨！”

右派分子的家属和亲友都受到牵连，我的哥哥雷任远被迫害致死。他是丰都中学数学教师，也长于绘画。1959 年大庆时奉命为墙报画刊头，他画的是天安门，为了突出主体，背景画得较暗，这是绘画的基本常识。可是就只因这个刊头把他打成反革命分子，关进了监狱。照他们的逻辑，父亲是被镇压的反革命，弟弟是右派分子，他当然心怀不满，故意污蔑新社会，把天安门画成一团漆黑。1960 年初死在狱中，刚刚 26 岁，教书一年多。说是病死，不知真正的冤情如何。他身体强壮，朴实忠厚，性格憨直，不善言辞，依说不会得罪什么人，可是竟遭此荒唐的不白之冤。右派分子 55 万或者 300 多万，至少有几倍亲友受牵连，这次运动受害者至少上亿，实是震惊世界的大冤案。

这次运动也使许多家庭解体，如葛佩琦蒙冤 20 多年后，虽然得到昭雪，但已妻离子散。我班唯一女右派彭玉君被强行与结婚不几年的丈夫离婚，以后的遭遇很悲惨。金太林与热恋女友被迫分手，他的女友章伯萍是我们同班同学，漂亮活泼，20 多年后我见到她，已经是个呆呆的老太婆了，终日只有以泪洗面，后来脑萎缩，完全痴呆，四年前凄苦去世。没有调查统计过，全国历次政治运动造成多少家庭悲剧，这些特别重大的社会悲剧是谁造成的？没有离异的右派家庭可能很少，我知道章伯钧的夫人宁愿成为右派与丈夫一起下地狱也不肯离婚，让人崇敬。

十年浩劫后，大家盼着冤案平反，却只等到“改正”。不管怎样，恢复了工作，恢复了人的尊严。在工作中都很努力，要把失去了的青春补回来。几年后都被评为高级教师，金太林、廖常勇和张淮明当了校长，其他同学也都是教学骨干，作出了很大成绩。课余时间则笔耕不息，突出的是黄鹏先、彭玉君、廖常勇。黄鹏先在浮躁的当今社会甘于寂寞，勤于笔耕，发表文章 500 多篇，200 多万字，专著 10 本，尤其在儿童文学方面有丰硕成果，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彭玉君以古稀之年完成系列长篇小说《梦幻三部曲》，成为四川作家协会会员。廖常勇、周义亨、雷崇功等人也发表小说、诗歌、散文和学术论文多篇，取得一定的成绩。

我们这个班 46 人，已有 14 人去世，我们这一网 12 人只有多灾多难的周义亨 2008 年去世，廖常勇 2010 年去世，冯孝敏今年 6 月去世。黄鹏先腿脚疼痛行走不便，他们与其他同学会面少一些，但与大家也有联系。我们其他同网 8 人每年至少都要聚会 1—2 次，相信这种友情会永远保持下去。

经过几十年的苦难，我觉得头脑很清醒，对世界看得更清楚，对从前和现在的谎言嗤之以鼻，近四年多为了避免老年痴呆，在博联社、凤凰网、博客中国等网站开了博客，写了八十多篇时政博文，有多篇博文被墙内外多家网站转载。其中有五篇论述反右运动，另外有多篇也涉及到反右。

“朝闻道，夕死可矣。”能够与储安平、傅雷、刘宾雁这些精英同在一网，也是幸运。九死一生，居然活过古稀，现在是无欲无畏，活得充实潇洒。这就是当右派的收获。希望右派们健康长寿，等到彻底平反的那一天，依法获得应有的精神和物质赔偿，看到真正自由民主的祖国屹立在东方。

2012.5.12 于武汉淌湖村

我的“右派”经历

龚韵琴

我 1922 年出生在一个世代书香的大家庭，祖父在 1897 年（光绪 23 年）考中举人；么祖父 1903 年留学日本，1905 年也考中末科举人。祖父倾向革命，并参加同盟会，武昌起义后在重庆蜀军政府中任行政部副部长。1913 年讨袁军兴，祖父复主持教育，积极兴办学校，与么祖父一起主教川东师范。我的父亲才识甚高，为人谦和慈善。父亲青年时正值四川军阀混战，曾在吕超处任过职，后投身教育界，先后在重属联中、川东师范、求精中学等校任教，深受学生爱戴。他对于革命青年更是尽力保护，早年参加北伐和广州起义的龚灿光老师就曾在我父亲帮助下逃脱反动派追捕。1935 年父亲不慎摔伤右腿，用药过量致残，只好退居田园，主要靠祖父、么祖父功名褒奖及薪俸置办的有限产业生活。1944 年我从巴女中高中毕业，家里已无力供养我上大学，再加上家里给我提亲，接着是婚恋、生养子女，我开始了艰难苦涩的家庭妇女生活。

1950 年，我得到乡人民政府支持，参加在巴县回龙坝五云山古寨举办的教师学习班。我背着吃奶的女儿上山学习，学习结束后，在巴县凤凰乡第三中心小学当教师。我无比珍惜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全身心投入工作，热情饱满，意气风发，充分展现了自己在教育工作上的才能，得到政府和群众的赞赏。1950 年 9 月，我调任凤凰乡第一中心校任校长，这是全区最大的重点完全小学，还包含了

幼儿园。当时正值土改时期，各种活动频繁，我顶风冒雪、披星戴月为工作、活动奔忙，一有事，穿上草鞋、拿起电筒就走。教育工会一成立，我就当选了北碚教育工会女工部长，并被推荐为北碚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许多会议都被邀请到主席台就坐。

但丈夫陈大钧此时在重庆市女中教书，子女又仍在老家，这样的分居不适宜养育儿女，不得已我请求调到市女中与丈夫团聚。我的申请得到了北碚政府和市女中龚灿光校长的同意，1951年下学期我调到了市女中教导处任学生生活辅导老师，开始了与全校高初中女学生朝夕相处、丰富多彩的生活辅导老师的工作经历，也进一步展示了我的教育才能和工作热情，是我一生中生活最美满充实的五年。

那时的市女中全校只有一个共产党员李坚（女），为了配合她展开思想工作，在市文教局领导肖华清、邓垦等人支持下，身为中国民主同盟重庆市委领导的龚灿光校长在市女中成立了民盟小组，先后吸收了李春阳、许嘉本和我加入民盟，并由我担任民盟小组组长。

1954年，市女中第一任校长龚灿光奉调去创办重庆师范专科学校，刘贝子继任市女中第二任校长。刘贝子校长支持我去重庆教师进修学院语文科带职学习，我终于取得了大学毕业文凭，圆了我曲折的求学梦。

1956年市中区为适应教育发展，新办了一批中学，急需新学校的校级干部，我被选派到千厮门的51中任副教导主任，与党员副教导主任范吉芬一道进行学校开办工作，先在附近的25中借教室上课，学校行政领导也由25中校长李任兼任。我在范主任领导下积极开展学生政治思想及教育管理工作，党组织还把我作为重点培养对象，让我参加党课学习。鼓励我争取入党。

1957年暑假来临前，市教育工会邀请部分工作成绩突出的会员到北温泉三花石疗养院疗养，市中区只有一个名额，考虑到我长期工作劳累，患有植物神经障碍等疾病，组织上把这唯一的名额给了我。

由于我在疗养院疗养，并没有参加1957年夏天的大鸣大放，也没有参加各中学教师集中在沙坪坝的反右斗争。但因反右斗争很快形成非要完成既定指标的局面，我校新调来的某领导认为我是民盟成员，且介绍我入盟的龚灿光老师已被定为“大右派”，便说“章罗联盟”黑线牵到了51中，还说我向党员主任范吉芬争夺领导权。在我毫无所知的情况下，突然通知我从疗养院到沙坪坝接受批判。一时间，无中生有、凭空捏造的言辞劈头盖脸袭来，哪里还有分辩的余地，只能成为政治运动的牺牲者。集中学习结束，回到学校我仍然是副教导主任，但开展工作名不正，言不顺，困难重重。

1958年4月终于宣布，给予我降职降薪处理，并下放到农村劳动。那位以完成运动指标为己任的新领导把范吉芬副主任也作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排挤了出去。在我下放农村之前，该领导还别有用心地吓唬我说农村苦得不得了，我会活不出来，等等，想逼我自动辞职。我出于对政治运动的无法理解，和对自己的清白充满信心，加上我从小形成的坚强性格，我丝毫不为他的恐吓所动，我暗下决心，为了自己的人格，为了家庭、为了孩子，我不能退缩，更不能寻短见，哪怕是刀山火海也要去闯，一定要等到水落石出、平反昭雪的时候到来。

1958年4月底，各校“右派分子”集中到53中，由储奇门坐汽车前往南桐，分配到两河口南娄

山山脉深处的农户家落户劳动改造。那时大儿子龙音 11 岁，女儿共珏 9 岁，小儿子三三才不足 5 岁，且正在儿科医院住院，在医院分别时，他站在小病床上和我道再见，让我眼泪夺眶而出。出发那天，丈夫大钧送我，我背着行李，大钧帮我提箱子，怅然送我上车，含泪而别。

我落户在眼镜塘深山老林中的贫农李树尧家，除参加农业劳动外，下工后还要帮他家作杂事、带小孩。李家是极为贫困的山区农民，破屋几间，难避风雨，火坑、土灶、禽畜共处。我就睡在鸡圈顶上，晚上听见对面山上虎叫狼嚎，心惊胆寒。由于贫困到极点，李家一家人的生活几乎是在死亡线上挣扎。李家老太婆七八十岁，一辈子没离开过家门口，连几十里外的两河口也不知是什么样子。生下的婴儿，也只能让其自生自灭，全无医药卫生可言，李家的一个病孩子就是让我抱在怀里眼睁睁看着他死去的。

要在这样的环境里坚持下来实在不容易，动摇是难免的，但无路可走，只有硬挺。我曾给我的哥哥写信说：“我现在过的生活可谓是解放前童养媳的生活。”我哥哥接信后，十分难过，一夜无眠。我哥哥和大钧都来信鼓励我、叮咛我，为了自己的清白，为了家庭、孩子，一定要坚持下去。

1958 年秋成立人民公社，我才离开李家，被调去为人民公社大伙食团办托儿所。大炼钢铁开始后，我们“右派”又集中到两河口，修王家坝到桃子荡的公路。修公路锤石子要展开竞赛，我为了争取好的表现，拼命一天锤完一立方石子，置体力消耗、筋骨劳损于不顾。锤完一方石子后，人几乎站不起来。当时不顾一切损伤体力，自然会留下后遗症，与我日后出现的多种疾病密切关联。后来又调我和熊先尧（来自重庆 41 中的年轻“右派”）搞小卖部。1959 年春节期间，我们到青年乡背汤圆心子，我竟背了九十六斤走几十里山路。公路修完后，又重新分配“右派”们到农民家劳动，这次我分到农民罗大爷家，住了半年。罗大爷待我如亲女，关心备至，令我终身难忘。

1960 年春节后，下放“右派分子”集体转到长寿湖农场飞龙区劳动。当年插秧，用绳子牵着直线，横竖笔直，不得差错，否则拔起重栽，一连几天几夜不下现场。有时半夜过后，加餐发点儿烧酒、胡豆，我趁别人未吃完时，倒在蓑衣上闭闭眼，就在田坎上睡几分钟。后来调我为队上的炊事员，从保管到烧饭煮菜，主要靠我一人担当，并很好地供应了全队伙食。

这时市里早已来信调我回城，娄书记一时不肯放我走，也未让我知道。这年 12 月，我被摘去“右派分子”帽子。1961 年 4 月，因我母亲生病病重，大钧来信嘱我请假回家探视。娄书记才说市里早有调令，既然请假，不如就此调回，于是我又调回 51 中。先在教导处作职员，仍管学生工作，后又管理医务室。在受歧视的情况下，虽然仍只拿四十多元的生活费，我照旧坚持把工作做得很好。新校长刘腾碧一直对我较好，1962 年我母亲病逝时，刘校长还关心我们有什么困难，需不需要帮助。怎么会没有困难呢？可我习惯了自己硬挺，不会向人伸手求助。

1979 年 3 月 1 日，重庆市委正式颁布红头文件，改正将我划为“右派分子”的错误，恢复我的政治名誉，对我进行平反昭雪，二十二年苦难屈辱生活从总的方面说，可算告个段落，但“恢复到原工资级别”这个问题却未能得到完全切实的解决，身心继续受到遗留问题的纠缠和困扰。我不在乎一生的重重苦难，虽然一辈子没有成就什么轰轰烈烈的事业，但我尊重自己，自问上不愧于天，下不愧于地，也不愧于社会、祖宗与家人。

(本文摘自龚韵琴未发表的回忆录《抹不去的记忆》。龚韵琴已于2000年10月病逝。)

金桂香里，魂归故土 ——记谭显殷安葬重庆南岸莲花山

谭 松

2012年9月20日，重庆南岸区莲花山公墓。

天，有些阴沉，偶尔，洒落几滴稀疏细雨。正是金桂花开时节，墓地里，千株金桂齐放，秋风习习，芳香阵阵。

下午三点半，一块墓地的石板被打开，一个褐红色的骨灰盒安放墓中。

没有爆竹、没有乐音，只有三束鲜花、两枚徽章、一排红烛。

泥土徐徐洒落，香烟袅袅飘升……

亲友们逐一在墓前默哀、鞠躬。

逝者当年的校友和战友尹凌女士捧上几枚缝在一块绸布上的徽章，一枚是他们当年（1949年前）的南开校徽，一枚是他们当年（1949年前）参加革命时地下社的徽章。徽章被放置在骨灰盒上，伴亡灵永存。

逝者地下社的战友、生前知己，重庆大学教授罗信群女士在女儿的搀扶下，面对墓碑泣不成声，站立不稳。

墓碑前，她与尹凌女士敬献的丝绸挽联在秋风中微微飘动。

82岁的廖代坊先生专程从巴南赶来，独自徒步爬上莲花山，在老友墓前深深鞠躬。

……

唯一的官方人士是南岸区统战部部长。他坚持前来的原因之一是逝者曾经为南岸区作出过“革命贡献”。

南岸，重庆市长江南岸，一块充填了亡灵主要人生岁月的土地。

激情、豪情、友情、爱情、亲情；

告密、批斗、惊恐、屈辱、悲愤。

1949年底，21岁的他受中共组织的指派，怀着建立“新中国”的万丈豪情，踏上了这块土地。

参加工作队餐风宿露，创建团区委上下奔波……

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天空仿佛是那么明亮；一个青年的未来，前景仿佛是那么宽广！

燃烧的革命激情，甜美的青春情爱……

然而，1957年，一场来自北京的六月寒雪、一封发自南岸区委的告密信件，点金为土，终结了虚幻的明朗天空和真实的青年梦想。

29岁的他，踏上了劳改之路，家虽未破，人却将亡（1960年和1962年）。南岸，成了他在流

放之地一个朝思暮想的地方。

四年半后，他终于又回到故地。但是，迎候他的，早已不是燃烧着激情的天空，而是江边一个破烂的菜棚。

山城夏天毒辣的酷热、长江冬天刺骨的寒风，交替打磨坐在菜摊前的帅气“菜贩”。

三天两头的“认罪交待”、长年累月的“政治运动”，比夏天的酷热、冬季的寒风更加摧折男儿身心。

从家门伸延到大街的“打倒”标语、从湖岸到江边的亡命逃亡……

还有——

大约是 1970 年，一个傍晚，卖菜归来的他偶然从一张《参考消息》上读到一条消息：台湾政府委派一位海军武官到美国接收一条军舰。他读到那位武官的名字——他当年南开中学的同班同学。当年，那位同学参加了三青团，跟国民党走了；他，加入了地下社，跟共产党走了。

当天晚上，他喝下半斤烧酒，然后捧着叶子烟抽得昏天黑地。

从 33 岁到 50 岁，一个男人最宝贵的年华，在南岸江边那个破烂菜棚里化作苍烟流泉。

他等到了他冤屈的“改正”，这是他有生之年的大幸；他没盼到他当年追求的实现（“反而越追求越黑暗”——战友尹凌在他灵堂上的话），这是他死不瞑目的大憾。

墓地的石板合上了，他从此长眠在这块他曾燃烧激情也曾饱受屈辱的土地。

这是一块让人魂牵梦萦的土地！

墓地山头的后面，便是那著名的黄山。抗战八年，陪都重庆，从领袖到民众，铁血壮志，浩气凌云！多少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足踏长江嘉陵，出生入死，慷慨悲歌……

他长眠此地，也是一种安慰和幸运。

墓碑旁的桂花，秋风里暗暗吐出缕缕幽香。

碑石上的遗像，默默注视着脚下滚滚长江。

那目光，深沉而忧郁，仿佛含蕴着深切的期盼……

右派长恨歌

血燃冰

忆昔徙流日，登船到古吴。辛酸双目泪，萧瑟一肩书。城廓望中远，烟云眼底舒。
飞鸥如眷眷，逝水似徐徐。野店吞芋粥，茅棚偎草蒲。北辰看渐近，南语沉来疏。
孤苦妒鸿雁，凄凉闻鹧鸪。废河尘土暗，荒地稼禾芜。沼泽栖蛇蟒，芦滩窜鼯狐。
碱蓬高七尺，卤水溢千湖，五月花何在，三春草未苏。咸知天地远，讵料异乡殊。
科罪成渣滓，流人变鬼巫。同眠屠狗辈，共食窃鸡徒。狼狈欺羊弱，鸡鹅笑鹤孤。
不愁容膝卧，只恨是囚居。饕虱兵马行，雷蚊列阵图。时时见斗殴，处处听咋呼。
褴褛衣衫破，嶙峋骨头羸。老拳眼底晃，秽语耳中淤。刮桶搜余粒，伸盘乞剩糊。

可怜贫阅历，尚幸别贤愚。阿 Q 蹲南面，华威卧北隅。馋涎流口角，乱发满头颅。
上下唆仇恨，弟兄相陷诬。胸怀空坦荡，血口啄卑污。下笔生灾祸，开言获罪辜。
口诛千手指，笔伐半年逾。泼墨乌云乱，浑身浊唾濡。含沙莫须有，捕影岂踌躇。
掘土五方日，披荒万亩余。忍心抛笔砚，誓死学犁锄。麦韭分高矮，黍粱别细粗。
黎明鱼贯出，昏黑雁行趋。盛夏挥余汗，隆冬脱剩襦。赤肩荷一担，双脚骋长途。
霜剑寒穿骨，风刀痛切肤。飞沙迷泪眼，烈日灼肌躯。食秣宁输马，拉犁差胜驴。
清香甘荠藿，粗粝悦糠麸。不厌凌晨起，敢辞午夜劬？号召胎骨换，信誓肝脑涂。
不死诚天幸，贪生岂蚁如？擂台万斤亩，挑战百胎猪。密植禾苗萎，深翻颗粒无。
洪流浸泥塌，长卧类僵蜍。罪贱几人愿，饥寒何处逋？映池惊水肿，倚仗病干枯。
赖有新交在，肯将旧习除？低吟胸臆句，偷读古人书。儋耳苏居士，潇湘屈大夫。
历来赞贞观，后贡惜扶苏。悔未营三窟，怜今守一株。穷途悲阮藉，歧路泣杨朱。
稚子称狗崽，娇妻成老嫗。家贫谁慰问？母病孰帮助？强笑抒幽愤，长歌当咽呜。
有日阴霾散，何时心腹剖？狂飙动天地，天地亦唏嘘。

作者简介：血燃冰，本名宋咏秋，福建政和人。原为海军文化教员，1957 年鸣放时打成右派分子，并送江苏北部东直劳改农场劳动改造。在劳动改造中秘密创作了这首五言长诗。将右派分子在劳动改造中的悲惨遭遇，刻画得入木三分。所幸这首诗未被劳改干部查获。否则不是杀身之祸，就是牢狱之灾。——摘自于疆《苏北利亚》123 页

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这本经还能念吗？

——和马龙闪先生商榷几个问题

茆家升

提要：1848 年 2 月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英文版首次发表，宣告马克思主义诞生。其核心内容包括阶级和阶级斗争、消灭私有制、暴力革命、和传统做彻底决裂等理论。掀起过世界性的大动荡，毁誉不一。然而，晚年马克思却说：“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恩格斯也一再说：“马克思本人从来不承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已从无产阶级专政的路线，走向争取普选权和实行民主制的道路。”可惜他们来不及修正，致使谬种流传。

斯大林正是打着“阶级斗争尖锐化”之类所谓的革命旗号，在苏联疯狂杀人，马龙闪先生文章中所谈斯大林在党内大开杀戒，只是在苏联全民大屠杀的一部分；而且很多被杀者，也曾是枉杀他人的人。

毛泽东以俄为师，也是打着“阶级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所谓革命旗号，在中国制造了无数灾难，也包括党内外的滥杀无辜！

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学说，是近百年来，苏联、中国和世界许多国家动乱、杀戮、饥饿和贫困的根源之一。

阶级斗争学说，就是制造社会“绞肉机”的歪理邪说，从来就没有过什么是科学的，什么是庸俗化之分！当务之急是认清它邪恶的本质，彻底抛弃它！

读《炎黄春秋》2012年第八期马龙闪先生的大作《斯大林为何在党内大开杀戒》一文，获益匪浅。这是一篇信息量较大，值得一读的文章。围绕着斯大林在党内大开杀戒，谈到了很多事。有一些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如苏联对农民的残酷压迫与剥夺；也有一些我们不大熟悉但确是早已存在的事实，如作者披露了“在1943年1月召开的苏共十七大会议上，赋予党以直接管理国家和管理经济的万能职权，给党的最高领导人以真正的无限权力。具体措施是，从中央到地方，党的各级委员会设置了与政府完全平行的、名称相同的生产一业务部，而把相应的同一政府部门置于党的同名称部的领导之下”。比如说莫斯科市，有个市政府，政府之外还有个苏共莫斯科市委，而这个苏共莫斯科市委是管着莫斯科市政府的，全苏联都一样。（以俄为师，中共北京市委也管着北京市政府，全国也一样。）我阅历有限，不知道如此重大问题，在马先生此文之前还在那里出现过。我真的是读到了这个事实，才对很多问题豁然开朗的。从这里出发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很多事。比如说政府和各行业多这一套的管理系统，除去维护自己的统治，对老百姓来说，有多少好处呢？他们整天都在干些什么呢？从中国的经历看，毛时代他们主要的工作，似乎平时就是搞阶级分析，如排单位的左、中、右名单等；运动期间就狠抓阶级斗争了。像反右斗争，就是各单位党组织，直接发动领导，并绕过公检法，做出各种包括刑事判决的处罚，不问你是不是党员。

马龙闪先生这篇大作是谈斯大林在党内大肆杀人的，党外的事谈的很少。文章当然可以这么写，不必要面面俱到。但是就苏联杀人之事而言，就不能不谈到斯大林党内大开杀戒，只是他在全苏联大开杀戒的一部分而已。这大批被杀的人，不可能都是斯大林直接批准的，而是党的各级领导批准执行的。而各级领导之中，一些人又被更上一层领导杀了，而最上层党的一些领导，最后被斯大林杀了。为什么要理顺这层层关系呢？因为这些被斯大林杀掉的党内的人，他们在被杀之前，许多人也是杀老百姓和下属的刽子手。我们不能只看到他们被斯大林冤杀了，就遗忘了宽恕了他们都曾经滥杀过人。按递进规律，职位越高的人，杀人越多！还必须要说的是，这种层层杀人的事，固然原因很复杂，但根本的一条，都是奉行阶级与阶级斗争的“革命真理”的结果！都在说这是革命的需要。斯大林们这么说，毛泽东们这么说，波尔布特到临死之前也是这么说的。

了解了这种历史大背景，对如何评述马先生这篇大作，十分重要。我们还是先看一看，马先生在这方面是怎样论述的吧。

第一条他说与“浓厚的宗教思想和教派厮杀的传统”有关。这一条就有点不靠谱。我们知道俄罗斯是个有着浓厚宗教情结的国家。作为和天主教、基督新教并列的俄罗斯东正教，是基督教的三大派别之一，在俄罗斯传播已有一千多年，是俄国人的精神家园。在一千多年的流变中，东正教有过很多纷争与变革，有时矛盾会很激烈，甚至有过械斗和残杀。这种教派斗争，马先生认为对俄罗斯民族，乃至俄国的革命者和解放运动有着深远影响。

这句话乍看起来，似乎也有一定道理。但当了解到东正教在苏共时代的悲惨命运，你就会知道马先生是否有些舍本逐末了。

毋庸讳言，东正教是苏共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的反对者，列宁就说过宗教是鸦片，是麻痹人民的。所以早在 1921 年到 1922 年列宁时代，就被勒令上交全部宗教物品，矛盾已激化。仅在 1937 年 8 月 8 日—1938 年 10 月 19 日，就有 20765 名教徒被杀害。至二战前教会体系几被彻底消灭。

苏共在宗教问题上的倒行逆施，从此就种下了与信教的几近全体俄罗斯人的仇恨种子，仅从这一点看，苏联与苏共的灭亡，也是历史的必然。

斯大林们迫害宗教与宗教界人士，也是他们杀害全体俄罗斯人之中的一部分，与他党内大开杀戒，谈不上有什么直接关联。而且列宁斯大林们，能彻底摧毁全体俄罗斯人的精神家园东正教，打的也是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这张牌。

马先生的大作第二部分，说到“俄国解放运动的各派也毫无宽容性”。文中提到俄国解放运动中的民粹主义，和俄罗斯国粹中的斯拉夫派。还说到“俄国的民粹主义作为一种社会运动，从 19 世纪 60 年代一登上政治舞台，其急进的一翼就表现出了一种激进主义的偏执和不惜流血好斗的狂热性。”此言对斯大林党内大开杀戒，应该说有一些接近，但还不是问题的核心。如果换一个话题，讨论共产主义革命（现在的历史定位，所谓十月革命，不是革命而是叛乱）为何能在俄罗斯成功，激进的民粹主义与宗教派系斗争，作为一种社会基础，倒是更符合实际一些。与斯大林党内大肆杀人，也没有什么太多的直接关联。导致斯大林大肆杀人的根本原因，依然是马克思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

马先生文中第三节小标题“对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庸俗化”。它应该是问题的核心了，值得认真探讨。

马先生说了，所谓阶级论庸俗化，就是“把一切社会意识解释成阶级性的产物，坚持狭隘的、教条主义的、无所不包的、绝对化的阶级论，使其外延无所不包、无所不至。……斯大林在 20 世纪 20 年代下半年期接过这一理论，把它改造成了‘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其表现形式就是大搞‘阶级斗争扩大化’。把什么都说成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反映、无限扩大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概念。”接下来就是实施无产阶级专政，用暴力手段消灭剥削阶级和一切所谓敌对势力；也包党内反对派、阶级异己分子和革命意志衰退的人。于是一场持续在斯大林执政的全过程的大屠杀大清洗，全面开始了。

马先生所说的严重后果，随着有关档案的解密，都已是不争的事实。问题是造成这样严重后果的因素，虽然很多，但最重要的还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何谓阶级斗争？就是一个阶级压迫、消灭另一个阶级。怎样才能消灭掉另一个阶级？当然只有通过暴力革命的手段了：摧毁敌对阶级的武装力量、舆论阵地和经济基础，直到把敌对阶级的人群，实施强制性的关押、流放和处决，当然最有效的措施，就是杀人了！这方面我和马先生没有什么分歧。

我和马龙闪先生的主要分歧在于：马先生认为造成这样严重后果的根本原因，是斯大林们把马克思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庸俗化了。但依然坚持那位洋马先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是革命真理；我则认为世界近百年的动乱穷困饥饿和无辜死亡，虽说因素也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条，还是马克思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系列理论，并没有什么“科学的”和“庸俗的”之分。

马龙闪先生的观点有很大的代表性，当我们遇到很多类似问题时，总会听到有人在说，是谁把马克思革命理论庸俗化了，马克思的本义不是这么说的，云云。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真的有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和庸俗化的马克思主义之分吗？

我们还是先听听中国的马先生是怎么说的，他在本文第三节开端即说：“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原本是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闪耀着光辉的革命真理，是认识社会、指导革命的锐利武器。”

这个篇开的真是有先声夺人之势，这种结论式的论断，真令我们读者难以置喙。你看它既是闪耀着光辉的革命真理，又是认识社会指导革命的锐利武器，我们还敢对它说三道四吗？除了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坚决奉行，直至顶礼膜拜！你还能干什么？想怀疑吗？想反对、想推翻它吗？那你能想到过后果吗？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反动势力？根本的一条，不就是反对或曰颠覆马克思主义这条所谓的根本原理吗？远的什么第二国际，什么考茨基、伯恩斯坦，我们弄不清不说它了，仅打着反修防修旗号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据叶帅所言，中国就是一亿人挨整，死难两千万人！

人们不禁要问，既然这位洋马先生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成为凛凛不可犯的金科玉律，就是牺牲上千万人的身家性命，也要竭力维护它，那它一定是能够雄视古今，会给全人类带来无限幸福与美好，带来光明与正义，带来富足与快乐。是所谓“放之四海皆准”的革命真理了；可是为何一旦它被庸俗化了，它又是能给信奉它的国家，带来长时间动乱、饥荒和亿万斯人的枉死呢？！

如此看来，如何划分什么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什么是庸俗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真是太重要了！岂止是云泥之别，简直一个是天使，一个是魔鬼！

马先生关于什么是庸俗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已经从理论到实践，谈了很多了。那么我们更期待的是马先生告诉我们，什么才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马先生说，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就存在把马克思主义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庸俗化、公式化、绝对化、教条化的思潮和派别，这就是所谓的庸俗社会学派。何以判断他们庸俗了呢？因为“他们不是站在反映论的立场上，从经济基础、从所有的社会阶级斗争条件，从其整个联系中引出思想现象。”打住。马龙闪先生是不是要告诉我们，只要坚持所谓庸俗社会学者未办到的上述种种，即所谓否定的否定，就能得到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了？不过我仔细盯着这只有 42 个字的几句话，看了一遍又一遍，依然莫知所云。还是弄不懂什么是科学的反映论？什么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什么是所有的社会阶级斗争条件，又是怎样的从其整个联系中引出思想现象？我越引越糊涂了，作为国家社科院研究员写的文章，怎么语句也读不通呢？难道所谓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没有什么“科学的”和“庸俗的”之分，是作者硬要从中划出杠子来，才弄成这样不尴不尬的混乱？是本土的马先生被洋马先生忽悠了，还是洋马先生和本土马先生一起，在忽悠我们这些愚民？

人们还有理由进一步追问：凭什么说马克思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是革命真理？有实践证明吗？用它来指导革命，有成功的吗？斯大林把它庸俗化了，有谁把它科学化了呢？是毛泽东，是霍查，是齐奥塞斯库，是卡斯特罗，是波尔布特，还是金日成金正日金正恩？

说到用它来认识世界，那就是至今还有许多人念念不忘的阶级分析论了。从马克思到列宁斯大林

毛泽东，都一直在谈什么人的阶级属性，要给社会上的各色人等做什么阶级定位，然后圈定阶级斗争的对象，这种划分圈定，全凭掌权者的利益需求，甚至一时兴起，各种身份各种帽子可以信口胡侃！想整谁都可以找一个帽子给你戴上，而且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

我是亲身亲历者，对此刻骨铭心。我戴过四年右派帽子、十七年摘帽右派的帽子，至今还是改正右派或曰原右派人员，依然还是一些人眼中的异类。毛时代生产停滞，文化衰退，甚至旷古未有的文革中，大、中、小学一律停课，都去干嘛呢？有事干呀，有神圣的、伟大的、保证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宏伟事业，等待他们去完成呀！头一件大事当然是阶级划分阶级斗争了！现在的中青年人根本就不会知道毛时代中国有多少类所谓敌对人员：四类分子、五类分子、九种人、二十一种人……这些都是大路货。还有特殊待遇的：如睡在伟大领袖毛主席身边的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中国二号走资派邓小平、全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等。这些还都是水面上的，水下的还有内控人员、反动的社会基础人员、等待被引蛇出洞者、中右或曰帽子拿在人民手中者。还有一时不能定性，档案中被黑了一笔的人。比如有人在文革混乱中，看到丢失在外的学生档案，一些所谓家庭成份不好的学生，档案中鲜明地写上：“高考不予录取！”如此推算下来，中国还有几个好人？难道这就是马龙闪先生们至今还坚持认为的马克思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还是“革命真理”和“锐利武器”？这些锐利武器刺向谁了？是刺伤帝修反了，还是刺伤刺死了奉行这种学说国家里的亿万百姓？毛时代天天念打倒帝修反的经，美帝苏修你是想刺，不过他们的剑比你的长也比你锋利，你得考虑后果；还是刺向手无寸铁又无话语权的中国老百姓能稳操胜券，想刺谁就刺谁，想怎么刺就怎么刺，想刺多少人都可以！想刺人时唱什么高调，都能随心所欲！所以毛泽东一生乐此不疲，说什么“八亿人口，不斗行吗？”“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毛泽东还直言不讳地说，他就是要比秦始皇厉害一百倍的独裁者，他把列宁和斯大林说成两把刀子，刀子就是用来杀人的！毛泽东经常说，革命就是一个阶级消灭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实质不就是为一己和小集团私利，制造矛盾，破坏法制，预设敌人，弄得骨肉相残，血雨腥风吗？

还有，何谓消灭私有制？是不是以所谓革命名义的征收掠夺，就像苏联的余粮征集制和流放杀戮富农，中国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和反瞒产私分，挖地三尺搜刮农民保命的口粮，致使苏联和中国朝鲜等国大批农民被饿死。他们打的也都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旗号。如果说他们也都把马克思的消灭私有制的革命理论庸俗化了，那马先生能告诉我，科学的消灭私有制是什么样子？

还有何谓和传统的制度与观念做什么彻底的决裂？怎么决，怎么裂？我们只看到在中国的反右和文革中，以破四旧和反封、资、修为名，五千年的中华文明被摧残与扫荡殆尽，历代先贤被掘墓鞭尸挫骨扬灰，活着的知识分子，多少人坠入人间炼狱。伴之而来的是文化消亡、道德沦丧、生产停滞、百姓遭殃！马龙闪先生是不是也要说，这也是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后果，那科学的和传统彻底决裂，又应该是什么样子呢？

马克思们依据阶级分析的条律，说什么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怎么联？联得起来吗？二战时屠杀中国人的基本上是日本的工人农民！这些日本的无产阶级杀中国的无产阶级时，有过怜悯之心吗？手发软过吗？据网上文章《原子弹下无冤魂》一文介绍，甲级战犯板垣征四郎的故乡日本广岛

市，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法西斯暴徒麋集之地。市里设立了一个什么“护国神社”，有人应征来中国杀人了，全村光荣，热情欢送；有人战死了，神社里立牌供奉，村人顶礼膜拜！板垣征四郎就是率领这伙法西斯暴徒，在中国烧杀淫掳，无恶不作。东北九一八事变是他们干的，南京大屠杀也是他们干的，台儿庄、平型关、昆仑关……板垣兵团都是急先锋，杀人如麻。而板垣兵团成员，基本上是广岛人，故又称广岛兵团，那是罪恶与血腥的代称！日寇攻陷南京时，广岛人上街欢呼雀跃，热烈庆祝。这些杀中国老百姓的人，欢庆侵占南京的广岛人，都是资产阶级分子吗？广岛人现在还年年纪念原子弹爆炸中的死难者，可是从未见过广岛人为侵华杀人忏悔道歉！广岛人不该死吗！？中日两国人民当然应该世代友好下去，但前提是日本政府和参与侵略屠杀中国人的所有日本人，不问他们是官员还是工人农民，都要真诚地道歉，还要按国际法实行战争赔偿！毛泽东说的不要赔了，没有法律效力！

写到这里我真是无限感慨，什么劳什子阶级和阶级斗争狗屁理论，给世界尤其是给我们国家带来如此大的伤害，差一点神州陆沉了，真不敢想象那个恶魔毛泽东，再要活上十年二十年，中国会给他糟蹋成什么样子？我更是百思莫解，如此显明的，几乎可以一眼看穿的什么阶级论的歪理邪说，为什么会在毛时代风行那么多年，至今阴魂不散，有些人还在顶礼膜拜？它的欺骗性在哪里？

我想，现在是不是已经到了应该实话实说的时候了。可不可以先到源头看看，本着寻求真理的心态，不要迷信那些光芒四射的什么伟大领袖，也不要顶礼膜拜那些曾显赫一时的什么理论权威。如果那些领袖们确是伟大的，他们将永远是百姓心中的丰碑；如果什么样的理论，确实为亿万斯民带来福祉，那它自然会被天下的百姓遵循、敬重和竭力维护的。相反的，如果哪位领袖，别问他是国王、总统、总书记、主席、大公，只要他在位时，为一己私利，坑害了本国和他国百姓，甚至造成千百万无辜百姓枉死者，那他迟早都会走向历史的被告席，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那些追随他的，不问是参与的作恶者，还是被愚弄者，为他唱亿万遍赞歌也无用。同样的道理，那些打着漂亮的旗号，炫耀着迷人的谎言，做过什么样乌托邦式承诺等等的所谓革命理论，只要它的后果是残害老百姓的，那它也只能有一个后果，就是被百姓唾弃，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这得从被称为共产主义的“圣经”《共产党宣言》说起。说起它真是感慨万千，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基督教的《圣经》，再也找不出第二本书，比它影响更大的了。这薄薄的一本小册子，从1848年2月第一次问世起，世界就再也没有安宁过了。它的作者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俩周围一些共产主义信徒，引起了世界的严重关注，有人视之为资产阶级世界的掘墓人。因为他们公然宣布，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用暴力方法，以阶级斗争形式，消灭私有制，消灭一切剥削和压迫，并说“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可以想见，此书一出，世界能不震惊吗？

更严重的是这一股在欧洲游荡的“共产主义幽灵”，它远不是说说写写，四处游游逛逛就了事的。它真的付诸革命行动了。经过短暂的“巴黎公社”实验之后，苏俄布尔什维克党（苏共）领导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这个庞然大物，真的就在一战之后的1917年横空出世了，而且伴随而来的，还有也是威力十足的“列宁主义”。紧接着二战之后，欧洲、亚洲、美洲又有十多个信奉共产主义的国家，相继诞生了。而且在世界人口最多的中国，还诞生了“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

这世界是不是真的要变色了，一个红彤彤的世界真的在向我们逼近了？如果马克思主义，包括它

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真的有无穷的生命力，能够给全人类带来福祉，那就让它砸碎万恶的旧世界，建立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又有何不可？社会发展的规律，总归是先进的、生命力旺盛的制度，取代落后的腐朽的旧制度。它也是历史前进的规律，不会因人的意志而改变。

可惜喧嚣多年的马克思主义，包括至今仍被某些人奉为圭臬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到了上世纪末，渐渐有了偃旗息鼓和穷途末路之势。具体点说就是自“苏东波”，尤其是庞大的苏联帝国解体苏共垮台，再加上人口最多共产党员数量也最多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先生宣布，不要再争论姓“社”姓“资”，而且明确否定了阶级斗争。从此风行一百多年的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学说，也包括后续的列宁—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从指导思想，走到了历史的被告席，毛泽东和斯大林，还和法西斯头子希特勒，一起被评为二十世纪祸害人类的三大恶魔！近年来学界也开始严重关注马克思主义源头存在的问题，其中最有一意义的一篇文章，说是马克思晚年不承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这看起来真像是个国际大笑话。其实它正说明，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以《共产党宣言》为代表的早期论述，很多地方是错误的、荒谬的。人们希望晚年的马克思，能从当时已有很多改变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实际出发，用科学的分析论证方法，提出更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可惜我们失望了，他未做到。从而使他的有价值的经济理论等，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已经影响式微，而他理论中的错误部分，则被后来人恶性利用，祸害世界多年，很多人至今出于种种原因，依然抱残守缺，自欺欺人，流毒至今。

马先生关于斯大林杀人问题，还谈到了苏联权力的个人化和独裁化过程，和由对党、对领袖的神化，发展到对斯大林个人的神化，及专制主义的权力观等问题。谈的都很深刻，我没有异议。所谓从一党专政走向领袖专政，走向对权力、对舆论、对经济的高度的三垄断，是苏联解体苏共消亡的根本原因，这也是近年热门话题。因为毛泽东就是中国的斯大林，所不同的是斯大林已经开始被清算，而毛还被一些人供着，中国政改的路依然关山难越，险阻重重。

这里要声明一下，本文目的，并非和马先生诘难。我想马先生未能划分出什么是科学的阶级斗争理论，什么是庸俗的阶级斗争理论，不是他的错。他划分不出来，世上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划分出来，谁还能给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们随便杀人，讲出科学的道理吗？

所谓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本来就是制造社会“绞肉机”的歪理邪说，只有彻底抛弃它，肃清它的流毒，国家才能理性、健康地向前发展。

2012年8月初稿

2012年11月二稿